“逆全球化”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笔谈

佟家栋， 谢丹阳， 包 群， 黄群慧， 李向阳，
刘志彪， 金 碚， 余淼杰， 王孝松

DOI:10.19581/j.cnki.ciejournal.2017.06.025

[编者按] 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一股“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这股思潮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对中国的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造成重大影响。为了推动对“逆全球化”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研究，我们在《中国工业经济》高端前沿论坛（2017·春季）暨“‘逆全球化’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研讨会嘉宾演讲的基础上，策划了本组笔谈。我们邀请 9 位知名学者深入探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逆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方案。这组笔谈试图解释并回答经济全球化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为发挥中国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向着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提供理论探索。

[关键词] 逆全球化； 全球价值链； “一带一路”； 工业化； 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制造业； 包容性全球化； 中美贸易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7)06-0005-55

“逆全球化”浪潮的源起及其走向：基于历史比较的视角

佟家栋， 刘 程

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欧罗克与威廉姆森在其经典文献《历史与全球化》中所言，基于边际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倾向于将 20 世纪 70 年代后的全球市场化和一体化过程视为不可逆转的线性趋势，然而更久远的历史证据及近年来动荡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都清晰地表明，人们有必要对这种乐观的简化推演和预测持审慎的态度①。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对立面，“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特指在经济全球化进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出现的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市场再分割现象。它包含了由全面开放退回到有条件开放，甚至封闭的过程。具体体现为在国际间对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流动设置的各种显性及隐性障碍。“逆全球化”不仅表现为一国政策对多边开放立场的反转，也表现为对区域一体化的逆转。在经历了最近一轮全球化所带来的普遍繁荣后，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大停滞(Great Stagnation)让全球各国对经济复苏和增长更为渴望，对当前的“逆全球化”态势更加焦虑，这些背景都使得当前对全球化的历史回顾和借鉴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简介] 佟家栋(1959—)，男，天津人，南开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刘程(1978—)，男，山东青岛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① O'Rourke, K., and J. Williamson.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a Nineteenth-Century Atlantic Economy[M]. MA: MIT Press, 1999.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全球化兴衰的历史回顾

作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副产物，"逆全球化"浪潮正在以一种越来越不容忽视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而 2016 年夏季的英国脱欧公投与冬季的美国总统大选，无疑成为了这一浪潮中的标志性事件。保守主义和封闭主义在人类文明社会最推崇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两个大本营同时取得了颇具讽刺意味的胜利。然而，事实上，当人们回顾近代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当前世界所面临的困境并非首次，其发端与背后成因亦有诸多相似之处。

1. 全球化的兴起

正如经济史学家 Harold(2001)所阐述的①，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始于 19 世纪末。尽管当时的科技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但无论其波及的地理广度、人口范围还是所导致的经济一体化深度，"全球化 1.0"的成就都是惊人的。国际贸易蓬勃兴起②，新兴市场(如阿根廷、德国和日本等)骤然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大量无需签证和护照的外国技术工人在各国间随意迁徙(Harold，2001)③，大规模的跨国直接或间接投资无需任何央行及外汇管理机构的审批即可畅通无阻。图 1 显示了在第一次全球化鼎盛时期惊人的贸易规模。"全球化 1.0"最重要的源起动力来自大西洋贸易的崛起④，而提供其所必需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则是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藉由同时代全球最强大的皇家海军力量和严格缜密的英镑金本位制度，从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金融秩序两个层面，英国强有力地支撑和维护了这一轮浪潮的兴起和扩展。与之相类似的，在第二轮全球化过程中，由美国所主导的制度性基础设施——世界经贸机构⑤和美元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有效地支撑了"全球化 2.0"的拓展和繁荣。在这一轮浪潮中扮演核心驱动力量的是来自东亚与大西洋两岸之间的三角贸易以及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中国、韩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开始以重要角色加入全球化版图。

2. "逆全球化"的兴起

同样，两次"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和扩散也有诸多相似之处。首先，源头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而贸易与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传染链条作用。金融危机的背后，都是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长期繁荣中所积累矛盾的集中爆发。

由后验的视角，可以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从根本上动摇和终结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1929 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在使美国经济瓦解的同时迅速波及欧洲，源自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所带来的传染使得当时刚从恶性通胀中挣脱出来的德国魏玛共和国再次陷入崩溃⑥。大量银行陷入资本金不足状态，为平抑市场的恐慌，1931 年德国央行(Reichsbank)不得不对濒临瓦解的银行体系采

---

① Harold，J.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② 1840—1901 年，世界的运输价格下降了 70%，大幅降低的贸易成本有力地刺激了世界贸易。参见 O'Rourke，K.，and J. Williamson.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The Evolution of a Nineteenth-Century Atlantic Economy[J].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2001，61(1)：256-259。

③ 当时大部分的移民来自西欧和亚洲，最受青睐的求职目的地是北美洲的纽约和南美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④ Acemoglu，D.，S. Johnson，and J. Robinson. Rise of Europe：Atlantic Trade，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95(3)：546-579.

⑤ 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⑥ 而在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所引致的欧洲债务危机中最先陷入崩溃的是希腊、爱尔兰和意大利等国家。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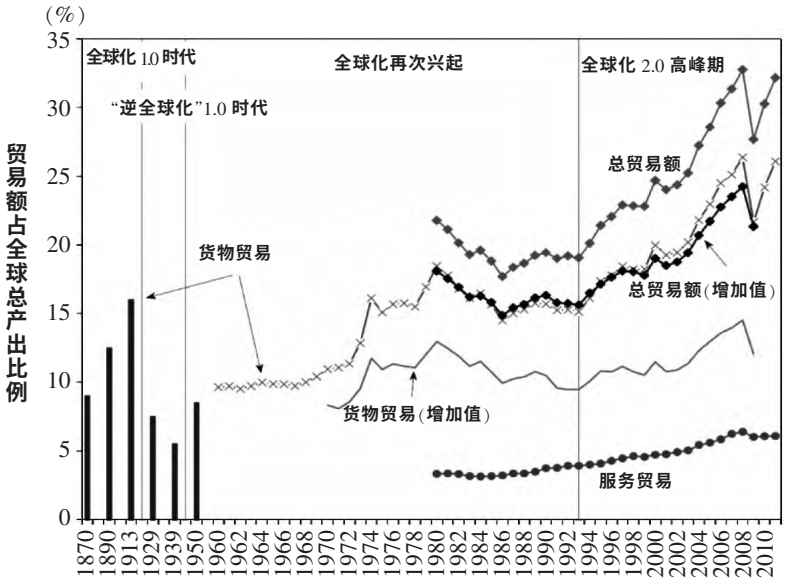

图 1　两次全球化及"逆全球化"过程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取了后来在 2009 年危机中由美国联邦储备局重现的纾困措施(Bail Out)①,这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的第二轮大通胀以及纳粹主义的兴起。

其次,也是尤为发人深省的是,实质性动摇全球化进程的主角,往往正是其缔造者和传播者。首次"逆全球化"兴起的 1931 年,在大西洋贸易的桥头堡英国,裹挟于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两党激烈纷争之中,英格兰银行突然宣布终结了作为全球化金融秩序基石的英镑金本位制度,并率先发动了以邻为壑的单方面贬值②,由此拉开了蔓延至全球的货币战与贸易战的序幕,从根本上动摇了第一次全球化进程③。而在"全球化 1.0"时代迅速崛起的大西洋对岸,以"美国复苏优先"为竞选纲领入主白宫的罗斯福政府同样给予了"全球化 1.0"以最沉重的一击。在英镑单边贬值后,1933 年美国宣布放弃与英、法两国继续签署双边汇率协定,让美元大幅贬值并提升进口关税④。与之颇有雷同的是,美国联邦储备局于 2009 年率先启动的三次量化宽松计划促成了随后五年间美元的快速贬值。高举

① 然而与美元量化宽松可在全球范围内稀释从而减轻美国国内通胀不同,当时的德国马克还主要是德国境内的流通货币,大规模救赎所带来的财政政策货币化使得德国第二次陷入通胀深渊。参见 McElligott, A.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Germany: Weimar German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数据来源:Bank of England Archive(G4/154), http://www.bankofengland.co.uk/archive/Documents/archivedocs。

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常每一轮保护主义浪潮中贸易战的开端往往都会伴有遮掩性的伪装,如英国时任首相张伯伦在英镑贬值的同时推出"英联邦自由贸易"运动,即在英联邦及殖民地间推行自由贸易,而对非联邦及殖民地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而在 2008 年后的衰退中,美国政府也一再以"买美国货"(Buy America)的堂皇理由来公然推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④ 面对英镑贬值和贸易保护双重压力,1933 年罗斯福政府跟进加入贸易和货币战,宣布美元贬值和加征进口品关税。这使得德国和日本的出口受到重创,外汇储备迅速枯竭。参见 Tooze, A.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J].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07, 40(2): 429-431。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美国优先"旗帜[①]的第45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赢得竞选后，也旋即出台了退出TPP、增加边境调节税等带有浓厚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措施[②]。

3. 两次全球化及其逆转的经验教训

历史经验留下了两个直观而重要的教训。首先，"逆全球化"的灾难性后果由所有加入这个一体化体系的国家共同承受，而相对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正处于追赶阶段的新兴市场则受创更深。在第一次由开放转向封闭的全球性贸易战和货币战中，当时的世界主要出口导向型新兴经济体（如日本、魏玛德国和阿根廷等）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以及大范围失业的冲击[③]，进而引发了灾难性的世界性冲突。换言之，在缺乏有效协商机制的前提下，单边主义的"逆全球化"政策，其局部的短期利得远远不能与由此所导致的系统性和长期性损失相匹配。然而对于这一点，民主体制本身并不能保证做出准确的经济和政治决策。

其次，第一次"逆全球化"过程中的英镑与黄金脱钩，以及当前第二次"逆全球化"思潮中的英国脱欧和美国排外主义的兴起，本质上都是全球化缔造者（也是其早期核心受益者）在后期失去利益分配主导权后的反戈一击，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这种试图凌驾于自身所缔造秩序之上的冒险行动必然会加速催生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即原有体系内公共基础设施的崩塌，以及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孕育和诞生。然而，这一过程极有可能曲折而痛苦，经济成本也极为高昂。世界各国应对传统全球化领袖国家的政策动向保持警惕，并尽可能增加协商和对话，通过提供必要的经济动机和集体压力来避免其彻底走向孤立主义。

二、"逆全球化"力量的产生与集聚

毫无疑问，历次的经济全球化及其背后的赫克歇尔—俄林分工秩序都有一个明确的福利指向，那就是要素在一国内及国际间的相对收入改变。当这种变化所产生的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调和时，代表失意者诉求的保护主义政治力量就会开始聚集和强化。关于在"全球化1.0"时代中的这种由开放向封闭的演化，经济史学家欧罗克和威廉姆森曾有过经典的论证。当时整个西欧的地主阶级都因来自新大陆物美价廉的农产品而遭受了沉重的经济冲击，这导致保护主义运动率先兴起在原本大西洋自由贸易的发起方（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典）。关税和配额的快速增加补贴了西欧的土地所有者以及部分工业从业者。而在美国，劳工限制法案的逐次出台[④]，也反映出对持续快速涌入的欧洲移民的抵制力量在不断累积[⑤]。就这样，大西洋两岸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抵制赫克歇尔—俄林分工的

① 关于"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外交政策纲领的阐述可参见美国白宫新闻处网站：https://www.whitehouse.gov/america-first-foreign-policy。

② 与1933年罗斯福总统胜选相似的一点是，特朗普的重要票源也来自广大城市蓝领及非城市选民。

③ 参见 Clavin, P. The Fetishes of So-Called International Bankers' Central Bank Co-operation for the 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 1932—1933[J].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992, 1(3): 281-311。

④ 20世纪2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了1921年的《紧急配额法》和1924年的《约翰逊—里德法》，从而进入有限移民时期。其主要内容是以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移民来源基数为基础，对各国每年移民人数实行配额限制。结果使得来自欧洲的移民减少，其中，东欧和南欧移民的配额只占1/5；来自亚洲的移民（菲律宾除外）几乎完全停止；来自美洲的移民大幅度增加。参见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M].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⑤ O'Rourke and Williamson（1999）详尽阐述了这一逆转的过程。参见 O'Rourke, K., and J. Williamson.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a Nineteenth-Century Atlantic Economy [M]. MA: MIT Press, 1999。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道路。

相似地,在“全球化 2.0”时代,一体化政策事实上也有诸多抵制的声音,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2005 年《(欧盟)宪法条约》(Constitutional Treaty)的公投就提供了一个“欧洲版全球化”遭受抵制的经典案例。《(欧盟)宪法条约》旨在整合原有分散的既有历史条约,从而为走向欧盟治理的深度一体化奠定基础。原本认为其实施不会有太大阻力,但在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投中,该条约两次被否决。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多数选民认为该条约将使得更多本国工作被外包到劳动力更便宜的东欧成员国。公投后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高技术含量职业的从业者支持公约,而蓝领工人、普通文职白领以及农民则压倒性地投了否决票。欧盟委员会在重新包装该条约后以《里斯本条约》的新形式再次推出,并不再给法国和荷兰公投的机会,然而在爱尔兰的公投结果仍是否决,抵制力量也仍然如出一辙,都柏林相对收入更低的地区成为反对票的重要票仓。然而,这些抵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 2016 年的英国脱欧公投。

脱欧公投后的报告调查了英国几乎全部 380 个辖区的投票特征与结果。在控制了区域固定效应以及其他数据特征后发现,生活水平、人口特征、移民(特别是新近移民的增加)、文化和社区凝聚力都对“脱欧”倾向有重要影响,并且遭受全球化冲击的深度与排外主义倾向之间有显著的联系。例如,遭受进口竞争压力最大的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成为支持脱欧的重要选区,而长期受益于全球化的伦敦则拥有极高的反对脱欧投票①。遗憾的是,经济学家的意见并没有被选民充分了解和认知。这一方面源于全球化与国家整体生产力提升之间的显著联系没有得到充分宣传,另一方面经济学也没有能够明确指出“逆全球化”所可能带来的高昂代价和损失。

三、收入不平等加剧与“逆全球化”

生产的全球化使资本要素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极大的延伸,也使得生产资本以获取全球绝对要素优势的最高诉求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依据边际产出以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间接投资的形式与全球市场相融合,由此产生的全球价值链和分工塑造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大范围转移。除此以外,高收入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收入提升更快所导致的代际流动性下滑,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加剧,都为经济全球化政策的持续设置了更多阻力。

首先,工作机会不断减少。以美国为例,1979 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达到峰值的 1943 万人,此后持续下降,从 2000 年的 1727 万人最多时下降至 2010 年的 1153 万人,2016 年也仅恢复至 1235 万人。而制造业就业在总就业中的占比也持续下滑,由 1943 年最高的 38.7%下降到 2016 年底的 8.4%,如图 2 所示。

其次,劳动者的绝对收入(剔除物价影响)在代际间的流动性持续下滑。基于不同年代出生的美国劳动者及其父辈的收入调查显示,1970—2014 年处于 30 岁的劳动者收入超过其父母(同为 30 岁时)的比例从 90%跌落到了 41%②,如图 3 所示。而在这其中,下滑最剧烈的恰恰是中产阶层(社会收入排位处于 30%—70%的人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高收入阶层(社会前 10%)的子女收入超过父母的比例则稳定维持在高位。换言之,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收入增长的主要部分集中于高收入家庭,而中产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提升越来越困难。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收入在代际间下

① 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外来移民的增加是刺激排外主义情绪的重要诱因。在一些问卷调查中发现,对外来移民的不满与投票支持“脱欧”之间有显著正向联系。

② Chetty, R., D. Grusky, M. Hell, N. Hendren, R. Manduca, and J. Narang. The Fading American Dream: Trends in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 Since 1940[J]. Science, 2017,356(6336):398-406.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滑的主要驱动力并非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而是来自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全球化的福利在同龄人中的分配很大程度上集中于高收入群体，因而整体经济的增速提升并不能缓解在总劳动人口中的代际收入下滑，而这些广大群体就成为对全球化不满的主要力量来源。

最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加剧。图4显示了两次全球化过程中各国收入在前1%的人口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可以清晰地发现两点：一是在两次全球化的高潮期都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而第一次全球化的退潮期则出现了长达四十年的收入平等化过程。二是收入不平等越严重的国家，往往对于全球化的抵制力量也越强，如美国和英国；而收入不平等越缓和的国家，对全球化的抵制则相对越弱，如丹麦和瑞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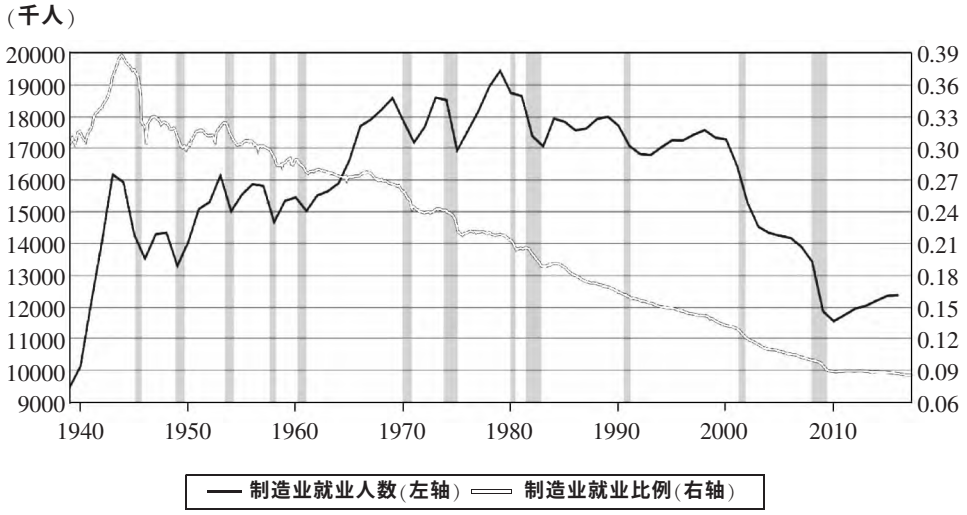

图2　1940—2016年全球化与美国制造业就业持续下滑走势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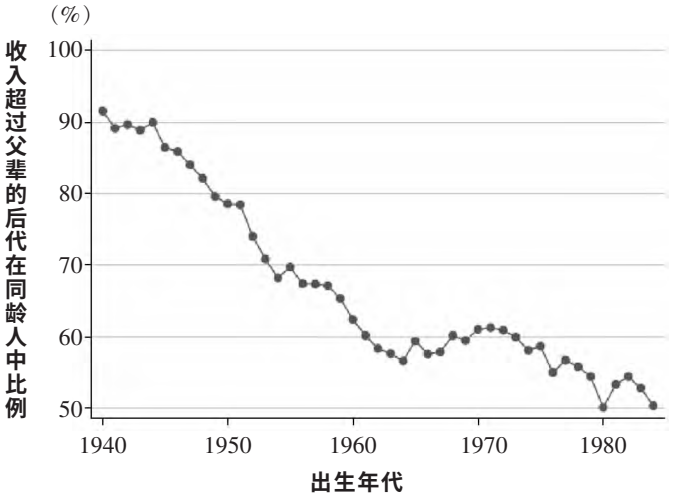

图3　美国劳动者代际流动性的恶化趋势

资料来源：Chetty, R., D. Grusky, M. Hell, N. Hendren, R. Manduca, and J. Narang. The Fading American Dream: Trends in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 Since 1940[J]. Science, 2017,356(6336):398-406。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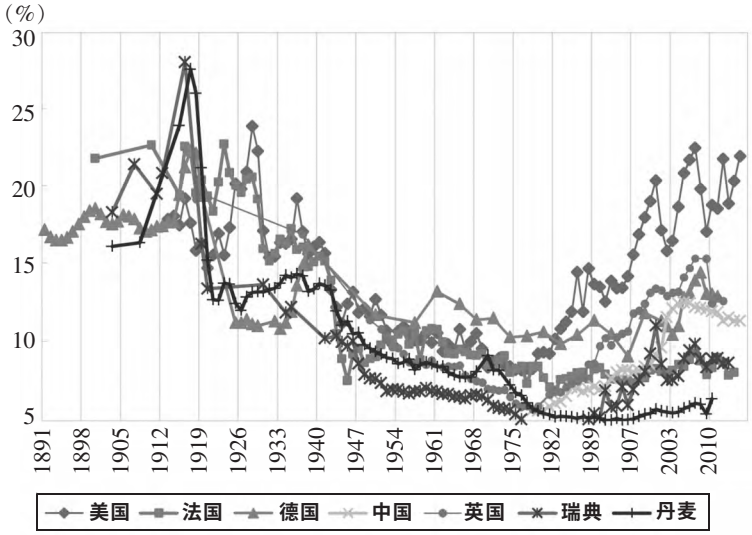

图 4　1891—2015 年全球化过程中各国收入前 1%的人口占社会总收入比例

资料来源: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

四、可持续的全球化路径

历史表明,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与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总是如影相随。尽管自由贸易等开放政策为全球所有参与贸易开放的国家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福利,但即使是如英国、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全球化福利在各个产业部门、利益群体,进而在地域间的分布都是极为不均衡的,这导致了国家整体福利提升与部分地区和人群整体福利损失并存的矛盾。而由于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受损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容低估,这一经济现实在诸如脱欧公投等事件中已经充分暴露①。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自由贸易等经济全球化政策所产生的福利在社会内部的再分配对于全球化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②。

而对于福利再分配与全球化关系的深入思考,将使得人们重新审视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早在全球化与不平等问题出现争论的初期,国际经济领域的著名学者丹尼·罗迪克就曾提出过一个基于"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③(Trilemma of Global Economy)理论的假说,即更开放、更一体化的市场将必然需要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来支撑④。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开放政策本质上是将本国要素(如劳动力)融入全球统一市场,在获取国际标准的要素收入的同时将本国劳动者置于更剧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之中,随之而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本国收入及消费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于全球化后不因本国意志而改变的两个客观约束,即贸易条件波

① Colantone, I, and P. Stanig. Global Competition and Brexit[R]. BAFFI CAREFIN Centre Research Paper, 2016.

② Autor, D., D. Dorn, and G.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6): 2121-2168.

③ 即一国政府仅能同时选取全球化、政策主权和民主政体三个政策目标中的任意两个,放弃第三个。参见 Dani, R. How Far Wil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Go[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0, 14(1): 177-186。

④ Rodrik, D. Why Do More Open Economies Have Bigger Government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 106(5): 997-1032.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动的外生性和本国出口品类的集中度①。因而，如果要让占多数的选民长期持续支持这种引致更高风险的对外政策，政府就必须竭力以多种形式扩大财政支出以对冲和保障选民所遭受的风险。如果政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任何"亲全球化"的政策和机制就必然会遭遇强烈的政治抵制、废止，甚至被逆转。

仍以英国脱欧公投为例。大量外来移民导致政府公租屋、公立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服务的竞争加剧，这是相当多英国选民投下支持脱欧选票的重要原因。理论上，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人均公共服务不足问题有两种路径，一种是通过限制移民数量（降低分母），一种是通过扩大财政公共支出（增加分子）。但现实当中有两方面的因素导致第一种选择更易胜出。其一，发达国家的人均公共服务存量和流量相对发展中国家更高，因而在人口基数扩大时提升分子消耗的财政资源相对更多，这增加了政策难度；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多数发达国家本身处在全球化进程的第一阵营，与"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理论相一致，其政府支出的相对规模已处于高位，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已经达到战后的历史峰值（如美国），再加之经济危机的重创，扩张财政的难度不言而喻。两相权衡，"排外"就成为了短期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

这种经济全球化与政府支出之间的正向联系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传统观念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在国与国之间实现更为完全的"单一市场"，而由于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通常被认为是替代关系，所以更深的市场一体化似乎应伴随着更少的政府支出规模。然而事实上，这与经验研究的证据并不相符②。换言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市场开放与政府支出之间事实上更多的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简单替代关系。开放度越高的经济体，其公共服务的支出增长也越快，对发达国家尤其如此。反过来，这一经济逻辑也意味着，任何一个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如果忽视了对于本国要素所有者的风险对冲和社会保障的政策安排，则将必然遭受政治上的抵制和失败。事实上，近年来愈加被学术界所关注的全球化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Scandinavian Fantasy）③的实质，就是在融入欧洲一体化市场的过程中，同步扩大政府在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从而试图在全球化带来的要素生产效率提升与群体间收入差距扩大之间取得动态平衡。

五、结语

本文通过回顾两次全球化历史的兴衰，指出了间隔百年的两次"逆全球化"之间的相似性与规律性。囿于"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约束，当全球化的发起国逐步丧失在国际间的主导权以及在国内的政治平衡时，在缺乏有效协商机制的情况下，单边主义的"逆全球化"政策极有可能登上舞台，尽管其经济损失远大于可能的收益。这反映了在全球化、主权政策和民主制度之间的政策取舍并不必然有利于全球一体化的加深。

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在两次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之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没有跟上增长的步伐。工作机会的迁移，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在代际间的固化加重了这种不平衡性。"逆全球化" 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内未能更广泛地分享全球化福祉的群体对现实的不满和反

① 贸易条件的外生波动源于外国的技术进步等非本国可控制的因素；出口品类的集中度则意味着当遭受意外增强的外国商品竞争压力时，本国出口收入与消费的下滑程度。通常一国无法自主决定出口品类的集中度。

② 例如，欧盟中开放度最高的荷兰、挪威、奥地利和丹麦，同时也是整个欧盟内财政支出规模（相对 GDP 的比例）最高的几个国家。经验研究表明这并非偶然。参见 Rodrik，D. Why Do More Open Economies Have Bigger Governmen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8，106(5)：997-1032。

③ Landersø，R.，and J. J. Heckman. The Scandinavian Fantasy：The Sources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Denmark and the U.S[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16，119(1)：178-230.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击。针对这一点，研究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自由市场机制与国家主权政策并非单纯的替代关系，而是存在互补性。一国政府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应随开放度的提升同步加大对公共服务品的提供，从而对冲本国加入单一市场后由贸易条件波动和出口品类集中所带来的外生冲击和风险，忽视这一点的全球化政策是难以持续的。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的兴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那就是摧毁整个庞大的全球化系统仅需要短短几年的时间，而重新建立一整套为各国所接受的全球化体系与秩序却需要数十年之功。要使全球化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动力，必须使各国从根本上摒弃全球化是国与国之间的零和博弈的认知。

〔责任编辑：许明〕

包容性全球化探析

谢丹阳， 程 坤

增长与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在 2008 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1950 年以来，年增长超过 7%并持续 25 年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共有 13 个，包括巴西、中国、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的特点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发展，其原因存在着共性。首要共性就是保持对全球经济开放。"然而，2016 年以来，英国脱欧、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事件相继发生。这些事件表明，全球化进程正受到阻碍，"逆全球化"思潮涌动。本文从包容性角度出发，试图深入理解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问题。

一、全球化的现状

1. 关于全球化的主流看法

目前关于全球化的主流观点大致如下：观点一，全球化使得比较优势得以彰显，全球资源配置更有效率；观点二，全球化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资本逐利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工薪阶层，但不利于发达国家的中下阶层和发展中国家的底层人民。其中，观点一是古典的看法，出发点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观点二则是现实的看法。大量事实和研究表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并且极大地提升了资本的流动性。资本与劳动更为高效地结合，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中有数亿人因受益于全球化而摆脱了贫困。但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对发达国家中下阶层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加剧了西方国家内部不平等的现象。

从全球化、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分配的关系看，全球化提升了经济增长并改善了全球收入分配状况①。Darvas（2016）基于 128 个国家数据的研究发现，全球基尼系数从 1989 年的 0.67 减少到 2013

[作者简介] 谢丹阳（1964—），男，安徽祁门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程坤（1986—），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Sala-i-Martin, X.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Falling Poverty and Convergence, Period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121(2): 351-397。Mishkin, F. S. Why We Shouldn't Turn Our Backs on Financial Globalization[J]. Frontiers of Research on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2009, 56(1):139-170。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年的0.59，表明全球的收入分配得到了改善①。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人均收入大幅上升，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已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这一全球收入分配改善的趋势也被 Lakner and Milanovic（2013）的研究所印证②。1988—2008年，收入水平占全球55%分位的群体，其收入累计增幅最大，约达75%。这一群体主要代表了新兴市场国家的中等收入阶层；全球收入水平处在顶层1%的人群（99%分位），其收入累计增长大致为65%；而全球收入水平在80%分位的人群，这20年里收入几乎没有增长，没有分享到全球化的成果（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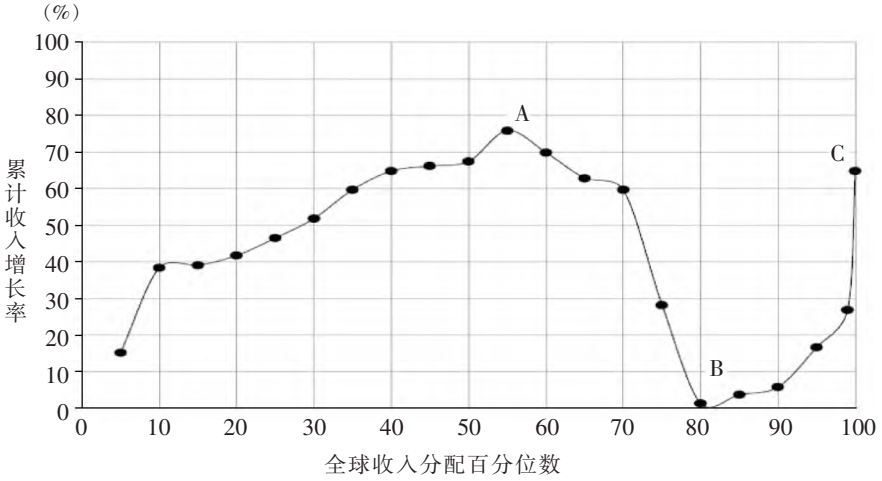

图1　1988—2008年全球收入增长率曲线

资料来源：Lakner，C.，and B. Milanovic. 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o the Great Recession[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13。

然而，从各个国家的情况看，收入分配是恶化的，比如中国的基尼系数就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15升至2016年的0.47。Piketty et al.（2017）利用国民收入和财产数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库的数据修正了中国收入分布后发现③，中国顶层10%收入的群体，其收入总额占全部收入总额的比值从1978年的27%上升到2015年的41%；而同期，中国收入最低的50%的群体，其收入占比从27%下降到15%。换言之，收入最低的50%的群体曾经拥有与最富有的10%的群体相同的收入份额，而现在后者是前者的2.7倍。如果换算成具体收入差距的话，1978年顶层10%的人群的收入水平大约是收入最低50%的人群的5倍，而到2015年，该比值达到13.5倍（见图2）。

2. "逆全球化"的形成原因

2016年英国脱欧，这意味着欧盟一体化的巨大倒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所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比如提高关税、反对自由贸易、控制移民等政策，也大大阻碍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① Darvas，S. 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New Estimates of Global and Regional Inequality[R]. Bruegel Blue Print Working Paper，2016.

② Lakner，C.，and B. Milanovic. 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o the Great Recession[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13.

③ Piketty，T.，L. Yang，and G. Zucman. Capital Accumulation，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1978—2015[R]. NBER Working Paper，2017.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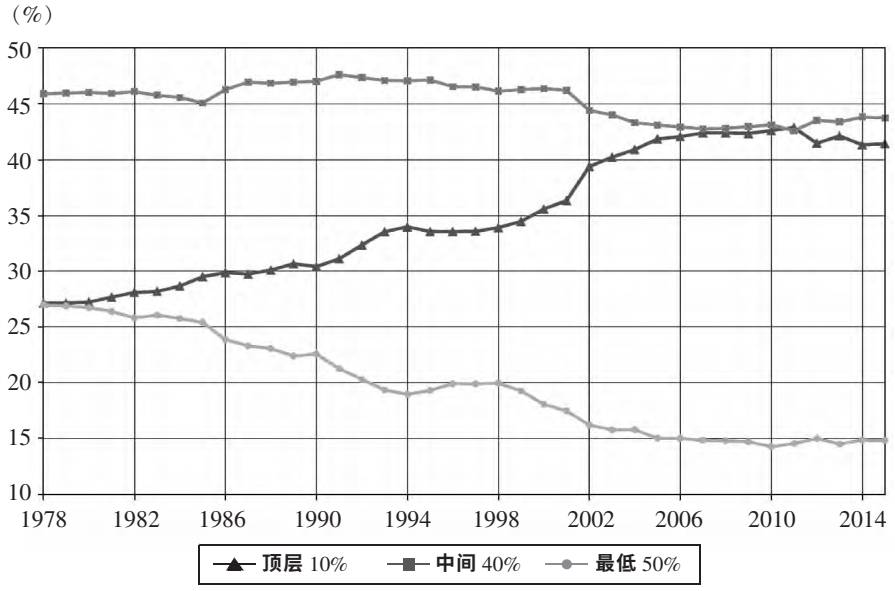

图 2　1978—2015中国收入分配情况

资料来源:Piketty, T., L. Yang, and G. Zuc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15[R]. NBER Working Paper, 2017。

造成上述“逆全球化”现象的具体原因可分为长期原因、短期原因以及科技创新带来的冲击。

长期原因是国别收入分配的恶化,以及一些国家内部某些利益集团的阻力。全球化虽然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并没有带来财富的均衡分配,相反,往往拉大了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①。英国支持“脱欧”的民众当中不乏受全球化冲击最为严重的群体。他们在全球化进程中收入不但没有增长, 有的甚至还失去了工作。发达国家中的这类群体的失业现象在制造业中尤为常见。对于制造业而言,由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资本的流动性加强,而资本的逐利性会让其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生产要素价格更低廉的地方。因此,发达国家将大量的制造业迁往海外,使得留给国内的劳工工作岗位减少,引发这类群体的“逆全球化”情绪。

短期原因是一旦遇到金融危机,失业状况更为严重。迫于选民的压力,不少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导致全球经济“雪上加霜”。经济的低迷造成制造业产品需求减少,迫使工厂进一步控制成本,缩减工作岗位,从而导致大量失业。最近一轮“逆全球化”现象的开端就是 2008 年的次贷危机。

第三个原因是科技创新冲击劳工市场,造成大量失业。信息技术、机器人及其他高科技的运用和创新,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也造成了大批传统岗位的消失。据推测,自动驾驶技术一旦盛行,仅美国就可能将有 30 万司机失业。

由此可见,全球化的道路是不平坦的,甚至会出现迂回曲折。但是,全球化的大方向和主旋律将不会改变,在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前提下,全球化进程将得到可持续发展。

① Barro, J.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0,5(1):87-120.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全球化的包容性

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最早可追溯到五千年前印度文明与两河流域的贸易往来。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期出现了横跨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这不仅有力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贸易交流，同时也带动了欧亚非政治文化的传播。公元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东西方的互相探索、互相影响以及美洲大陆的发现，开拓了一系列新航路，进一步加强了东西方之间文化、贸易的交流。与此同时，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逐渐形成，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为世界市场的开放奠定基础。其后，交通运输技术不断得到提高，通讯基础设施不断得到改善。交通运输在马可波罗时代是以年为计时单位，如今，随着火车、飞机的出现，已经发展到以小时为单位。通讯系统的发展也如此，从书信，到电报、电话、电邮，再到今天广泛应用的视频会议，技术变革日新月异，未来全息眼镜的普及和使用，将使虚拟会议成为现实。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都将提高全球合作的效率。

提高全球合作效率的另一举措是国际贸易中的标准化。1946年10月，来自25个国家的64名代表在伦敦通过会议决定成立新的国际标准化机构——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它的主要功能是为制订统一的国际标准提供平台。其制定标准的内容涉及信息技术、交通运输、保健、环境和农业，等等。目前，ISO已经发布了17000多个国际标准，如ISO集装箱系列(世界上95%的海运集装箱都符合ISO标准)。集装箱的标准化，使得集装箱在外形、结构、标志等方面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运输工具、装卸设备相适应，极大地降低了物流成本，便利了国际贸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的融合也逐渐显现出来。比如，足球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尚不被重视，而如今，该项运动在美国已越来越普及。美国的足球人口已经紧随巴西，位居世界第二。各国在音乐、文学、舞蹈、影视等方面的交流也进一步深入。

随着人工智能领域的不断创新，即时翻译技术得到飞跃式的发展。在不久的将来，语言上的障碍将不复存在。

因此，我们认为全球化的大方向和主旋律不会改变，尽管由于各种原因，"逆全球化"的思潮时而涌现。当今世界已进入互联网时代，科技的进步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应该坚信，人类将有足够的智慧利用科技进步去提升全球化的包容性，使全球化进程得到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中引入福利社会的元素，社会主义制度中引入市场竞争的机制，这些都是人类智慧妥善解决社会矛盾的体现。同理，只要全球化能够让世界经济更加繁荣，那么人类一定能够通过推动包容性增长来解决分配的问题。

1. 包容性增长的关键点之一：平台建设

(1)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Arezki et al.(2017)指出，除去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以外，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远远滞后①。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城市化进程的继续深入，基础设施急需更新和扩建。他们的研究表明，一直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每年大约需要3.3万亿美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研究分析各个国家发展状况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质与量都非常关注，同时也特别强调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的建立。Seneviratne and Sun(2013)基于全球76个发

① Arezki，R.，P. Bolton，S. Peters，F. Samama，and J. Stiglitz. From Global Savings Glut to Financing Infrastructure[J]. Economic Policy，2017，(4)：221-261.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发现,基础设施越完善,越有助于促进收入平等①。依据他们的估计,越南、菲律宾和印尼的基础设施如果能够在 2010 年达到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这三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将减少 2 个百分点。针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地区发展关系的研究也有很多。Demurger (2001) 研究表明, 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能够解释中国省际间经济增长的不同②。Fan and Zhang (2004)基于 1996 年中国农业普查数据发现,农村基础设施的差异能够解释农村各地非农生产率以及农业生产率的差异③。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方面,中国具备一定的经验和优势。目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海外的项目数量已经超过世界银行;在国内,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利用项目开发所带来的土地升值收益来确保投资方回报。这种投融资方式及其对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了世界银行的充分肯定。

(2)商业平台和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建设。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之外,还必须搭建专职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商业平台和融资平台。从激励和效率方面考虑,这些平台应当由私人创建和运营(例如淘宝网),具有非竞争性但同时又有部分排他性。非竞争性意味着多个个体可以在同一时刻利用该平台,充分受益于平台边际成本低、覆盖面广的特点(例如淘宝商家)。部分排他性则确保了平台的收入,使平台所有者既有资金来源又有意愿去提升平台运作效率,从而进一步扩大盈利。部分排他性也即部分非排他性,换言之,这些平台具有溢出效应(例如,对京东和唯品会的影响)。政府可以对这些具有外部性的商业平台和融资平台予以部分资助。这些平台的建设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包容性增长的一项重要内容。

(3)职业转型平台建设。自动驾驶的盛行会导致大量的司机失业,FINTECH 技术的完善会导致许多金融从业者离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因其更准确、更方便的特性,会不会取代大量的医生?即时翻译技术的进步会迫使多少翻译人员改行?中国服务业一旦崛起并出口到发达国家,会影响多少发达国家服务阶层和技术人员? Acemoglu et al.(2015)通过研究离岸外包市场对创新、技术以及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发现离岸外包机会的增加,将导致工业发达国家中非技术工人的真实工资下降④。所以,职业转型平台建设极其重要,尤其对于发达国家而言。

(4)人才和资源平台建设。人才和资源平台的建设可以方便人才自由组合。一个人身兼数职在未来将不再罕见。同时,平台的建立有助于资源的临时组合,减少资源闲置。这些平台也方便人才和资源相互搭配。例如,滴滴出行和 UBER 目前虽然主要是整合打车市场,但它们的出现将加快整合诸如医护、餐饮、快递和家政等市场,促进资源共享,拓宽就业渠道。

2. 包容性增长的关键点之二:开放发展

为什么要开放发展?一是开放发展便于引进国际先进科技,加速科学技术发展。现代化生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技术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技术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竞争的主要核心力量。发展中国家因其科技水平较低,要引进学习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先进科学技术,来缩短

① Seneviratne, D., and Y. Sun. Infrastructur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ASEAN-5: What Are the Links[R]. IMF Working Paper, 2013.

② Demurger, S.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xplanation for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29):95-117.

③ Fan, S. G., and X. B. Zhang. Infra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4,(15):203-214.

④ Acemoglu, D., G. Gancia, and F. Zilibotti. Offshoring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 2015,7(3):84-122.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二是开放发展有助于引进国际化人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才流动已很少受到文化、语言以及空间距离的限制。人力资源的储备决定了国家和企业未来发展的空间。三是开放发展便于借鉴先进的国际理念和管理经验，从而提高经营效率，减少无谓成本。四是开放发展有助于一国在广阔的国际市场中更为专注于特定的产品和服务，而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会提高生产率。

近期的"逆全球化"思潮使得一些落后的贫穷国家忘却了坚持开放发展的上述理由，而对全球化抱以怀疑态度。我们认为，他们依然应该主动加入全球化大家庭。落后本身并不能保证追赶，开放发展才是追赶的前提。研究表明，无论是从世界各国角度看①，还是从中国各省份的情况分析②，只有开放才能追赶。

落后国家加入全球化大家庭的首要步骤包括：加强法制建设，尤其需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从而吸引国际资本；文字及数字化管理与世界接轨。这些是贯彻契约精神和加强国际合作的基础。此外，落后国家应当积极回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尤其那些政权更替较为频繁、法律建设严重滞后的国家，可以考虑主动划出特区，交由"一带一路"多边工作委员会管理，以打消潜在投资者的疑虑。

3. 包容性增长的关键点之三：超前转型

超前转型是指发展中国家应具有超前预期、转型升级的意识和能力，避免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举一个例子，美国的"铁锈地带"(Rust Belt)，比如底特律、克利夫兰、布法罗，作为美国工业中心地带，曾经是美国经济的引擎，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美国的产业结构、贸易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制造业岗位迅速减少，大量人口迁出这些地区。美国"铁锈地带"的一些小镇目前已沦为空城，成为"被遗忘的废墟"。美国政府经过多种尝试，发现解决"铁锈地带"问题需要通过校企合作，即结合当地原有基础和特点以及合作院校的学科优势，开拓新领域，发展新行业。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能够吸引年轻人，重新焕发城市活力。目前，中国东北三省已出现工业设施老旧废弃、大量人口迁出等现象。我们应当从美国"铁锈地带"的解决方案中受到启发。

三、中国的策略以及努力的方向

第一，加强法治建设。中国的法律法规仍然还不够完备。虽然这一点并没有严重妨碍我们的商品贸易融入国际社会，这主要得益于中国香港市场经济和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起到的桥梁作用。下一阶段，随着中国服务业进出口的进一步发展，贸易伙伴对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短期内可以继续发挥香港这个平台优势，但最终还需不断加强自身的法治建设。

第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努力成为世界知识中心。科学技术与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知识产权的地位和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与日剧增。成为世界知识中心是实现中国崛起的重要环节。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必须予以保护。否则，整个国家将缺乏创新动力，永远处于世界知识创造的边缘。

第三，加强人才储备工作，吸引国际人才。充裕的优秀人才储备是任何国家成为强国的必备条件。2010 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国际人口不到 100 万

① Lucas, R. E. Trade and the Diffusio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09, 1(1): 1–25.

② 沈沁，谢丹阳. 全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容置疑[J]. 金融研究，2016，(2)：86–95.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而发达国家国际人口占比通常在 10%左右。中国想要从人才大国稳步提升到人才强国,就必须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构建能够吸引国际人才的机制和制度。

四、结论

本文在深入理解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基础上,探讨了包容性增长对全球化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全球化进程不会因目前所受到的阻碍而停滞不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使全球化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大胆设想。我们必须从平台建设、开放发展、超前转型三个方面来推动包容性增长,克服“逆全球化”思潮带来的困难。

〔责任编辑:覃毅〕

经济全球化可逆吗

包　群

2016 年以来,以“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当选”两大事件为标志,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逆全球化”冲击,尤其是特朗普所宣称的“边境筑墙、提高关税”等以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言行更是引发了人们的广泛担忧。对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中国经济而言,这场“逆全球化风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显而易见,加剧了中国企业面临世界经济政策环境不确定性的经营风险与潜在冲击。2017 年 3 月 8 日,李克强总理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强调“当前世界经济低迷,‘逆全球化’思潮抬头”。

这场“逆全球化”浪潮提醒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与谨慎对待融入全球化的挑战与风险,本文通过梳理当前全球化发展趋势与研究文献,总结以下核心观点。首先,当前逆全球化危机并非个别领导人突如其来的政策选择, 而是美国等国家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导向的全球化利害得失的权衡计算结果,一个代表性例子就是 Autor et al.(2013)所批评的中国进口导致美国工人失业的“中国综合症”①。其次,当前全球化是构筑在价值链分工网络体系的坚实基础上,与传统贸易模式具有本质区别,并不会因为个别国家的单边政策转向而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最后,这场“逆全球化风波”也提醒我们理性、谨慎地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的必要性,重视国内需求与本地市场的作用、通过国内制度环境建设提升开放质量、加强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对中国企业有效预防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一、为什么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的

1. “中国综合症”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各国依赖各自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开展商品交换能够提高贸易参与国的福利水平是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核心结论,那么,为何在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全球分工不断深化的今天还会出现这样一股“逆全球化”思潮?显然,“去”全球化也好,“逆”全球化也罢,各国面对贸易开放的政策选择

[作者简介]　包群(1978—),男,湖南怀化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① Autor, D., D. Dorn, and G. H.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6): 2121-2168.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归根结底取决于贸易利益的得失权衡。以美国为例。必须强调的是，作为"二战"以后长期以来大力倡导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国家，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并非始于特朗普。事实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奥巴马政府就提出了"新经济战略"，其战略核心就是重视国内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让美国重新回归实体经济。这一"再工业化"战略提出的重要背景就是金融危机下经济低迷导致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其主要目的也是希冀通过重振美国制造业来为美国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那么，美国国内的高失业率究竟与全球化有何内在关联？部分美国学者给出的答案是进口贸易冲击，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进口品冲击是导致美国国内失业率剧增的"罪魁祸首"之一。

2013年，Autor、Dorn和Hanson三位劳动经济学知名学者共同发表了一篇题为"The China Syndrome"（中国综合症）的研究论文，其核心结论就是中国进口竞争品对美国国内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使得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就业率降低和平均工资水平下降。根据作者的测算结果，比较2000—2007年间受中国进口竞争品冲击幅度分别位于25%分位与75%分位的两个行业，进口贸易冲击使得这两个行业的就业规模与就业率的差异分别高达4.5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①。简言之，这篇研究论文不仅证实了中国进口品冲击的确导致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而且提供了这一冲击幅度不容小觑的定量依据。值得强调的是，这一研究团队在后续研究中证实了"中国综合症"的严重性，例如，Acemoglu et al.(2016)考虑了上、下游企业的产业关联溢出效应，指出1999—2011年间中国进口导致美国就业损失了约200万个岗位机会，占同期总就业规模降幅的30%多②；Autor et al.(2016)则证实了中国进口竞争品也严重抑制了美国国内的研发创新③。

那么，是否存在中国进口贸易导致美国工人失业的"中国综合症"呢？从研究方法而言，Autor et al.(2013)的结论当然也会遇到样本选择、遗漏变量、模型设定等经验分析常见的问题。例如，Magyari(2017)发现微观企业层面则没有存在这一现象（样本选择）④；Feenstra et al.(2017)指出美国城市进口冲击与房价上涨紧密相关，一旦控制了房价因素则中国进口冲击的效果大幅度下降甚至不显著⑤；Rothwell(2017)则强调估计模型设定中应该考虑解释变量与时期效应的交互作用等⑥。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将美国制造业失业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中国进口冲击结果，那么，是否意味着减少或者限制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能显著带来美国就业率的回升？由于美国社会产业结构在过去一段时期发生了深刻转变，制造业失业率上升根本地反映了制造行业在美国经济中重要性的持续下降。从这一意义而言，中国进口冲击可能与国内产业结构变迁、技术进步与国内需求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并无本质区别，或者至少是这些因素长期交互的综合结果。

① Autor, D., D. Dorn, and G.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6): 2121-2168.

② Acemoglu, D., D. Autor, D. Dorn, G. Hanson, and B. Price. 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U.S. Employment Sag of the 2000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6, 34(S1): 141-198.

③ Autor, D., D. Dorn, G. Hanson, G. Pisano, and P. Shu. Foreign Competition and Domestic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U.S. Patents[R]. MIT Working Paper, 2016.

④ Magyari, I. Firm Reorganization, Chinese Imports, and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R]. Columbia Working Paper, 2017.

⑤ Feenstra, R., H. Ma, and Y. Xu.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ment[R]. UC Davis Working Paper, 2017.

⑥ Rothwell, J. Cutting the Losses: Reassessing the Cos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to Workers and Communities[R]. Gallup Working Paper, 2017.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的新型全球化:荣辱与共

既然一国对于贸易开放的心态与政策归根结底取决于贸易福利的得失计算,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看到,在当今各国经济紧密联系的全球化时期,经济开放的时代潮流很难为个别国家的政府言行或是政策干预所左右。有别于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分工格局与贸易行为,当前全球化具有以下突出特征: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为基础,以微观企业跨国经营活动为载体,以供应链不同环节的增加值核算为依托,以中间投入品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在这种以微观企业跨国活动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各国经济之间不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合作关系,而且也产生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国际贸易风险共享机制。在这一深度融合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在国与国之间划分国际分工的边界已经被极大弱化, 也决定了单个国家难以凭借单边国家主义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例如,与传统世界经济同步性研究不同,研究发现,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中间投入品贸易已经成为影响各国经济联动效应的重要传递渠道①。

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一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新型全球化时代,各国企业通过外包、中间投入品贸易、企业内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不仅能够充分获取全球化带来的福利与收益,而且还要共同面对与承担全球化所产生的贸易危机传染效应。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一旦供应链的任何一个环节受到外部冲击,都会通过放大效应作用于整条供应链引发贸易额的大幅缩减。以美国金融危机为例,已有研究表明,有别于传统世界经济周期运行,全球价值链体系下经济危机的波及与传染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持久性上都要表现得更为深刻与猛烈。由于价值链通过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交货和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将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企业通过上下游产业分工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损俱损"的风险共享现象。例如,Di Giovanni and Levchenko(2010)研究发现,在那些存在相互投入关系的部门之间的贸易行为对经济协同性的影响更为显著, 原因就在于这些互为投入关系的部门之间依存关系要更为深入②。在这种荣辱与共的分工格局下,各国经济都难以独善其身,即存在国际贸易的"第三国效应"(Third Country Effect)。iPhone 就是一个代表性的生产模式。尽管没有直接对美国出口 iPhone,但日本、韩国等 iPhone 零配件供应商早已经通过与中国企业的供应链关系形成了与美国的贸易往来。Kuroiwa and Kuwamori(2010)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后,韩国机电行业对美国出口的缩减中有 30.4%是由于与中国的"三角贸易"对美国出口的缩减造成的③。

① Burstein, A., C. Kurz, and L. Tesar. Trade,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Business Cycles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8, 55 (4): 775-795。Ng E.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and Business-cycle Comove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 82 (1): 1-14。Di Giovanni, J., and Levchenko, A. Putting the Parts together: Trade, Vertical Linkages, and Business Cycle Comove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0, 2 (2): 95-124。Bergin, P. R., R. C. Feenstra, and G. H. Hanson. Volatility Due to Offshoring: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85 (2):163-173。Johnson, R. C., and G. Noguera. 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86 (2): 224-236。Duval, R., N. Li, R. Saraf, and D. Seneviratne. Value-added Trade and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99): 251-262。

② Di Giovanni, J., and A. Levchenko. Putting the Parts Together: Trade, Vertical Linkages, and Business Cycle Comovement[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0, 2(2): 95-124.

③ Kuroiwa, I., and H. Kuwamori. Shock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Economic Crisis in Asia: An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Analysis[R].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Discussion Paper, 2010.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既然价值链分工已经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企业通过复杂的供应链关系紧密联结在一起，此时就很难像传统国际贸易那般凭借个别国家的贸易干预政策来达到预期目的。与此相反，新型全球化格局下一国企业重点考虑的问题从"专业化分工生产何种商品"转变为"应该位于价值链条何种位置"。Antràs and Chor(2013)在一篇影响深远的"Organizing Global Value Chain"研究中正是针对从研发、原材料供应、零配件生产、深度组装最终品到市场销售的价值链序贯分工特征，从产权理论视角探讨了跨国生产的内部组织现象①。不同价值链分工环节不仅决定了一国企业从全球化生产所能获取的收益多少，而且对一国企业在贸易危机时期的风险防御能力具有关键影响，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化尤为重要。以美国金融危机为例。Wang et al.(2016)将一国产出分解为国内消费最终品、出口最终品、出口中间投入品三种类型，其中，中间投入品出口又可分为直接用于进口国生产活动的浅度跨国生产和重新回流到本国与再出口至第三国的深度跨国生产②。他们发现，美国金融危机对国内产出活动的冲击最小(仅为 1.7%)，其次是最终品出口这一传统贸易模式，浅度跨国生产与深度跨国生产的下滑趋势最为明显，分别高达 16.9%与 28.5%。借鉴 Antràs and Chor(2013)的上游度测算指标，我们也对中国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贸易缩减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出口行业普遍受到了危机冲击，然而，企业在价值链越是位于上游环节，其贸易下滑幅度越为显著。这一现象也验证了贸易危机传导的"长鞭效应"，即始自供应链任一端点的危机冲击将会层层传导直至这一链条的最顶端。

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多年的深化发展，今天人们所观察到的全球化是构筑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坚实基础上，通过产品内贸易、垂直专业化、离岸外包等新型跨国经营模式将各国经济运行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当前的全球化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决定了这一潮流不会因为个别国家的国家利益取向或是政策态度转向而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美国的特朗普新政，我们不难排除一些国家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会实施暂时性的逆全球化措施，或是将贸易保护作为谋求经济利益的谈判筹码，但必须认识到这些国家的内部问题既不能完全归结为全球化冲击的结果，更非简单地通过构建贸易壁垒、倡导保护主义所能解决。也正是由于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复杂性与深刻性，使得个体国家难以像传统贸易模式中通过简单的单边贸易干预措施来达到政策目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价值链分工不仅意味着各个国家一方面能够从全球分工网络中获取对外开放的收益，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到世界经济危机与贸易风险的传染与冲击。当我们重新审视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尽管这一战略实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美国制造业的产出水平与就业规模，但终究难以逆转制造业在美国经济总体所占比重下滑的趋势，更难以根本性地改变全球生产网络的分工格局与贸易模式。

二、逆全球化风潮的现实启示

1. 国内市场的重要性

这次"逆全球化风波"也提醒我们，尽管中国企业已经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然而我们在大力促进出口的同时也必须足够重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加强对国内销售与内需的研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表现出强烈的出口导向型特征，但大部分中国企业仍然还不具备将商品销售到海外市场的能力或机会，换言之，大多数企业的目标市场仍然定位于国内

① Antràs, P., and D. Chor. Organiz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J]. Econometrica, 2013, 81(6): 2127-2204.

② Wang, Z., S. Wei, X. Yu, and K. Zhu. Characterizing Global Value Chains: Production Length and Upstreamness[R]. NBER Working Paper, 2016.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市场。基于世界银行 2002 年对 2400 家样本企业的调研数据，我们发现在本省及国内其他地区销售的企业数目最多（939 家），占全部样本企业的 39.13%；其余企业所占比重由高至低依次为仅在省内销售企业（33.88%）、所有市场均有销售企业（12.71%）、出口企业（9.00%）以及只在国内其他省份销售企业（5.29%）。这一结果表明，与只有小部分企业出口相比，绝大部分企业都有本地销售行为，其中相当部分企业目的地市场只限于经营地所在省份内部，没有发生对外市场扩张行为，证实了本地市场销售对企业经营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注意到大部分中国企业是以国内市场为销售目的地这一典型事实，遗憾的是与出口行为相比，我们对企业内销现象考察还相对较少。这一问题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在于，与国内市场高度一体化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内部市场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不同地区之间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国内市场分割现象，结果导致了即使在国内销售也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国内市场壁垒与贸易成本。例如，Poncet（2003）研究发现中国各省份之间的贸易流通壁垒与欧洲国家之间相差无几①；Bao et al.（2015）也指出存在国内贸易壁垒的情形下，企业即使是在国内异地销售也需要较高的生产率溢价②。

因此，尽管出口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逆全球化”思潮也提醒我们，即使在全球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仍然需要高度重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于中国这类国内市场幅员辽阔的大国经济尤为关键。事实上，“扩大内需”、“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已经成为近年来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所在，这也要求学术界给予国内市场研究更多的关注，包括存在国内市场分割、区域贸易壁垒与地方保护主义究竟对企业国内销售造成了什么影响；本地市场在企业对外扩张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进一步地，企业在不同目的地如何确定其销售决策与市场进入模式；在宏观层面，类似于国家之间的经济协同性，发展阶段存在天然差异的中国不同省份之间的经济协同性究竟如何；不同地区之间的商品、投资与劳动力要素流动对地区经济联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中国参与全球化分工体系时，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之间具有怎样的链接机制与互动效应。显然，重视国内市场与本地效应的重要性、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深入考察出口与国内市场的互动关系，对于今后中国经济如何更好地融入全球化体系、有效防范逆全球化风险具有至关重要的深远意义。

2. 从“以开放促进改革”到“以改革提升开放”

以 2001 年入世为代表性事件，“开放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推动力，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参与全球化的“开放红利”正在逐步递减；相反，中国出口模式的一些深度弊端正在日益加剧，严重地影响了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增长，包括出口产品质量偏低、过度依赖价格竞争、出口企业之间过度集聚形成了市场拥挤等③。不仅如此，出口价格竞争不仅导致了中国企业自身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且被诟病对其他国家出口行为造成了严重影响。此次“逆全球化”思潮也提醒我们，过度依赖低水平的出口不仅容易招致其他国家的针对性批评，而且也不利于自身的持续发展。入世至今，经

① Poncet, S. Measuring Chi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3, 14(1):1-21.

② Bao, Q., J. Huang, and Y. Wang. Productivity and Firms' Sales Destinati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23(3):620-637.

③ Amiti, M., and C. Freund. The Anatomy of China's Export Growth [A].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C].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李坤望，蒋为，宋立刚. 中国出口产品品质变动之谜：基于市场进入的微观解释[J]. 中国社会科学，2014,(3):80-103。叶宁华，包群，邵敏. 空间集聚，市场拥挤与我国出口企业的过度扩张[J]. 管理世界，2014,(1):58-72。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济开放的增长红利正在递减，是时候通过国内制度建设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与质量。事实上，国际贸易研究发现，除了自然条件、地理区位、要素禀赋这些传统因素以外，制度环境、制度质量的高低已经成为影响当今全球化时代一国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①。

回顾中国过去一段时间的改革开放历程不难看到，"改革"与"开放"这两条主线之间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以利用外商投资为例，尽管普遍认为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利用外资的问题所在。例如，与"市场换技术"的引资初衷不同，外商投资是否对中国本土企业产生了显著的技术外溢仍然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②；环保总局公布的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名单中不乏日立、百事可乐、雀巢等知名跨国公司，一些研究指出正如著名的"污染天堂假说"所强调的，外资企业存在着典型的双重环境标准③；邵敏与包群（2013）以不投保医疗保险、使员工超时工作、未按法定标准支付加班费等企业劳工侵权行为为例，实证考察了外资进入对当地内资企业的影响作用④。这些现象都提醒我们，无论是对外贸易也好，还是吸收外商投资，经济开放并不必然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甚至在某些情形下会带来恶性的负面影响。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经济在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甚至是对外投资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明显的规模水平，下一阶段的重点应该是从数量扩张转变为质量提升，此时国内制度环境的建设、法治体系的完善、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行政部门的人为干预等变得至关重要。仍以利用外资为例，企业所得税的统一、放松对外资进入的管制、采取负面清单做法等措施都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只有当一国经济开放构建在国内完备、成熟的制度环境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带动作用，也才能有效防御经济开放的潜在风险与外来冲击。

3. 重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

"逆全球化"对经济政策制订的重要影响就是加剧了政策不确定性。正如 2016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不确定性大大增强"。显然，有序、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需要一个能够合理预期、运行稳定的政策环境，使得企业能够根据自身预期进行生产与经营活动的调整。无论是英国退欧，还是特朗普新政，都使得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持续、稳定的全球开放经济体系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引发了人们对将来经济前景与政策走势的担忧与猜测。本质上，"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干扰在于加剧了经济环境的波动性、降低了经济政策的可预期性，从而使得企业、银行、消费者等微观主体难以进行合理的决策与规划。Bloom（2009）在分析全球经济复苏时指出，正是由于经济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企业由于无法合理预见投资收益而被迫延缓投资，信贷部门也趋向于缩减贷款活动，从而使得经济复苏步伐减缓⑤。

已有贸易政策研究大多针对某一类特定的政策措施进行评估，包括出口退税政策、补贴政策、反倾销/反补贴政策等。与具体政策措施相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关键特点在于其波动性与不可

① Nunn and Trefler（2013）对国内制度质量如何影响比较优势的作用机制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参阅：Nunn, N., and D. Trefler. Domestic Institutions as a Sourc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R]. NBEWorking Paper, 2013。

② Hale, G., and C. Long. Are There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J].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11, 16 (2): 135-153。Lu, Y., Z. G. Tao, and L. M. Zhu. Identifying FDI Spillover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107): 75-90。

③ 包群，陈媛媛，宋立刚. 外商投资与东道国环境污染：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吗[J]. 世界经济，2010，(1)：3-17.

④ 邵敏，包群. FDI 对我国国内劳工权益的影响——改善抑或是恶化[J]. 管理世界，2013，(9)：32-43.

⑤ Bloom, N. The Impact of Uncertainty Shocks[J]. Econometrica, 2009, 77(3): 623-685.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预见性,难以明确政策的具体目标与指向。因此,以下两个问题是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重点:一是如何合理地测度不确定性。Baker et al.(2016)致力于测算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综合各类不确定性的信息,包括主流媒体"不确定性"关键字眼的报道频率、研究报告中关于经济预测指标的争议度等,他们对美国、欧盟、中国等国家的经济不确定性进行了实际测算,证实了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运行的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上升①。二是不确定性影响经济活动的理论机制与作用渠道。在国际贸易政策领域,Handley (2014)、Handley and Limao (2015)、Limao and Maggi (2015)、Pierce and Schott (2016)、Feng et al.(2017) 等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尝试②。例如,Handley and Limao(2015)以中国"入世"为例,实证发现由于加入世贸组织降低了贸易政策波动性使得中国对美出口增加了 22%—30%。

这些文献无疑扩展了我们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解。然而,面临经济全球化波动性增加的今天,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认真审视政策不确定性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与风险,谨慎应对以美国为首的来自外部政策变动所带来的政策冲击与传染效应。例如,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化,一国企业经营活动不仅受到本国政策预期与变动的影响,而且也与国外(尤其是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政策不确定性密切相关,来自国外政策的突然改变如何冲击本国企业的生产活动与出口行为、各国政府的政策不确定性又具有怎样的关联与互动, 这些问题都对我们预防逆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至关重要。

三、总结性评述

尽管当前"逆全球化"风波对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干扰,尤其是加剧了国际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风险,但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不会因为某些国家的单边政策改变而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更不会因为个别领导人的短期言行与利益得失而倒退回闭关锁国、各自为政的封闭状态。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为基石,现今各国经济以微观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为主体,早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深度融合格局,也决定了在全球性经济危机困境下各国政府应该采取"同舟共济、携手共渡"的理性合作态度,而非实施以邻为壑、国别利益至上的单边主义政策。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虽然经济全球化大势不可逆,但对于早已密切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中国经济而言,需要未雨绸缪,及时应对这场"逆全球化"风波的可能冲击与潜在风险。告别过去那种单纯的粗放型出口扩张模式,积极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来培育国内需求,将对外开放牢牢地构筑在国内市场力量基础上,对于今后加强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联动与衔接具有重要意义。在逆全球化风波冲击下,面对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新形势,也要求我们充分重视经济政策制定的

① Baker, S. R., N. Bloom, and S. J. Davis.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131(4): 1593-1636.

② Handley, K. Exporting under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Theory and Evidenc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4, 94 (1): 50-66。Handley, K., and N. Limao. Trade and Investment under Policy Uncertainty: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5, 7(4): 189-222。Limao, N., and G. Maggi. Uncertainty and Trade Agreements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2015, 7 (4): 1-42。Pierce, J. R., and P. K. Schott.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7): 1632-1662。Feng, L., Z. Li, and D. L. Swenson.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106): 20-36。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不确定性风险，尤其是学会如何有效防范来自其他国家政策不确定性的外部冲击与传染，这对于今后中国经济的开放道路选择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覃毅〕

中国工业化进程及其对全球化的影响

黄群慧

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实现工业化是"中国梦"一个重要经济内涵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启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快速地推进了工业化进程。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工业化的目标。那么，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尤其是在步入经济新常态以后，现在中国工业化达到了什么水平，处于怎样的阶段，中国能否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并进一步顺利地成为工业化国家？从国际视野看，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会对世界工业化、全球化带来怎样的影响？

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中国在2020年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在2030年前后将全面实现工业化，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这将给世界工业化进程带来"颠覆性"影响。

自2006年我们开发出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以来，我们一直利用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对中国工业化水平进行连续的跟踪评价②。把工业化划分为前工业化、初期、中期、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利用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例、人口城市化率、第一产业就业占总体就业比重五个指标并赋予不同权重，取发达国家这五个指标在不同工业化阶段的经验数值范围作为标准值，我们构造了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对应工业化的前工业化、初期、中期、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该指数分别取值为0、1—33、34—66、67—100和大于100。利用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的最新测算表明，在经历了"十一五"时期的快速增长后，2010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66，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即将步入工业化后期。2011年以后中国工业化水平进入工业化后期。虽然整个"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逐步步入增速放缓、结构趋优的经济新常态，但到2015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指数仍然达到84③，中国工业化水平快速推进到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离基本实现工业化已经很近，而且我们从来没有离实现工业化如此之近。

进一步地，可以对2020年的工业化水平进行粗略估计。①从总体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看，如果根据"十二五"时期工业化速度推测，假定"十三五"时期中国能够保持"十二五"时期工业化速度，到2020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将超越100。但是考虑到工业化后期工业化进程逐步放缓的趋势，只要"十三五"时期工业化速度不大幅低于"十二五"时期（不低于60%），到2020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

[作者简介] 黄群慧（1966—），男，河北石家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① 黄群慧. 中国工业化进程：阶段、特征与前景[J]. 经济与管理，2013，(6)：5-11.

② 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J]. 经济研究，2006，(6)：4-15.

③ 黄群慧，李芳芳等. 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5）[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也会大于 95,大体接近 100。另外,计算出 1990—2015 年中国历年的工业化综合指数,将这一时间序列数据进行“S”形轨迹的拟合,发现在 2025 年前后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接近最大值 100①。②从工业化进程的具体衡量指标看,预计到 2020 年,中国人均 GDP 将超过 1.2 万美元,服务业比重达 55%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占商品增加值比例 60%左右,城镇化率超过 60%,三次产业结构非农产业就业占比超过 80%。人均 GDP 指标和三次产业产值结构指标已经落到了后工业化阶段标准值范围中;制造业增加值在 2010 年已经超过了 60%,达到后工业化后期的阶段,尽管近年有下降趋势,但只要不出现大规模“去工业化”,大体应该能够稳定在工业化后期阶段标准值范围中;城镇化率和三次产业结构中非农产业占比指标值则属于工业化后期的标准值范围。③从具体省级区域看,到 2015 年,上海、北京和天津都已经步入后工业化阶段,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东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也已经大于 90,预计到 2020 年,绝大多数东部省份和部分中部省份会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大多数中部省份会步入工业化后期后半阶段,而一半左右的西部省份将步入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因此,综上所述,对于中国这个预计 2020 年人口将达到 14.2 亿人口的大国而言,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大体接近 100,人均 GDP 和三次产业产值比例这两个关键指标达到后工业化阶段标准,可以认为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完成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基本实现工业化总体目标。但是,由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不平衡性,人口城市化率相对于工业化国家还较低,一些中西部省份工业化水平还较落后,到 2020 年,中国还没有全面实现工业化,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完全工业化国家。这意味着,2020 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后,中国还面临继续深化工业化进程、推进全面实现工业化的重大任务。

如果到 2030 年, 再经过 10 年左右的工业化进程的深化, 不仅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肯定超过 100,而且各个单项指标都会有更大的进展。综合现有的多家机构的预测,2030 年中国 GDP 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城镇化率也将超过 70%,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 65%,非农就业占比达到 90%,从这些指标看大致都会处于后工业化阶段。从各个省级区域看,绝大多数省份都会步入到后工业化阶段。而且,基于《中国制造 2025》规划,在 2025 年中国将步入世界制造强国行列,2035 年将达到世界制造强国的中等水平,这也意味着 2030 年前后中国一定应该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因此,如果不出现大的曲折,中国将在 2030 年前后全面实现工业化,进入到工业化国家行列,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工业化国家。

从工业化史看,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世界上也只有约 10 亿人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的工业化则是一个具有超过 13 亿人口的大国的工业化。因此,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对整个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具有“颠覆性”的影响,中国是否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仅事关一个国家能否繁荣富强,还决定着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改写人类历史②。

二、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

中国实现的工业化是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是符合“四化”同步发展要求的、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工业化。

无论是到 2020 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还是到 2030 年中国全面实现工业化,需要明确的是,中国所实现的工业化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工业化,而是信息化时代以信息化引导工业化、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下的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既要符合中国工业化阶段的国情,又要适应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世界工业化趋势。与老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环境不同,中国的快速

① 黄群慧,李芳芳等. 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5)[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② 黄群慧. 中国工业化进程:阶段、特征与前景[J]. 经济与管理, 2013,(7):5-11.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工业化进程与世界信息化趋势叠加。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中国要走区别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实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能充分发挥的要求的工业化。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从世界工业化发展趋势看，美国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更加关注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再工业化"战略不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产值比例，而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能力。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制造业信息化和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两个重要趋势。《中国制造 2025》的提出，也正是中国响应这种世界工业化发展趋势而制定的一项深化工业化进程的战略。

在"四化"同步战略驱动下，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基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评估，中国 "两化融合"发展指数已经由 2011 年的 52.73 增长到 2015 年的 72.68①。我们预计，到 2020 年，"两化"深度融合得到更大力度、更加实质的推进，"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两化融合"发展指数提高至 85 以上。到 2030 年，"两化融合"发展指数提高至 95 以上。也就是说，到 2030 年中国全面实现的工业化，是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

三、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化解"虚实"经济结构失衡，避免因"过早去工业化"而使工业化进程出现曲折。

虽然我们离实现工业化的梦想如此之近，但这并意味着我们可以一帆风顺地实现工业化。工业化史表明，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往往是曲折的，迄今为止真正成功"赶超"而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屈指可数，除了几个小的经济体外，大约只有日本等少数国家和地区成功实现了工业化。近些年，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服务化的趋势加大，经济发展中呈现出"脱实向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②：一是虚拟经济中的主体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国 GDP 比例快速增加，从 2001 年的 4.7%快速上升到 2015 年的 8.4%，2016 年初步核算的结果也是 8.4%，这几乎已经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例如，美国不足 7%，日本也只有 5%左右。二是中国实体经济规模占 GDP 比例快速下降，以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生产总值作为实体经济口径计算，从 2011 年 71.5%下降到 2015 年的 66.1%，2016 年初步核算的结果是 64.7%。三是金融板块的利润额已经占到所有上市公司利润额的 50%以上，这意味着金融板块企业超过了其他所有上市公司利润之和。麦肯锡一份针对中国 3500 家上市公司和美国 7000 家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利润 80%来自金融企业，而美国的经济利润只有 20%来自金融企业。四是实体经济中的主体制造业企业成本升高、利润下降、杠杆率提升，而且在货币供应量连续多年达到 12%以上、2011—2015 年货币供应量 M2 与 GDP 的比值从 1.74 上升到 2.03 的情况下，面对充裕的流动性，制造业资金却十分短缺，资金成本较高，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流向房地产市场，推动虚拟经济自我循环。金融业过度偏离为实体经济融资服务的本质、虚拟经济无法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种"脱实向虚"问题表明，实体经济供给与金融供给之间、实体经济供给与房地产供给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中国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否则伴随着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萎缩，会出现经济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但效率反而降低的"逆库兹涅兹化"问题。对于处于中等收

① 详见：http://www.image.ccidnet.com。

② 黄群慧. 着力提升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N]. 光明日报，2017-02-07.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入阶段中国而言,效率下降会加大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进而使中国不能够顺利地实现工业化①。

要深化工业化进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工业的发展。当今整个世界仍处于工业化时代,工业的重要地位并未改变。中国应该更加关注工业本身所蕴含的生产能力和知识积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技术创新的使用者和传播者。实际上,快速的、低成本的工业化战略造就了数量庞大的中国工业,但是也遗留下工业大而不强、工业发展质量亟待提升的重大问题。虽然从 2010 年开始中国制造业产值已经居世界第一位,但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还不及美国的 1/5。如果不能够继续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而提高效率,那么中国可能会因过早地“去工业化”而最终无法实现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的“中国梦”。而且,在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过程中,还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积极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所带来的高端挤压及资源争夺压力。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制造业的高度重视,意味着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竞争更多地是实体经济的竞争,是制造业发展的竞争。因此,未来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要迎接这些挑战,一是要处理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避免城市化与实体经济脱节,不能让房地产仅成为炒作对象,要让城市化进程真正发挥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引导作用。二是要处理好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深化工业化进程的重点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 要注意尽量减少由于电子商务大发展而产生的对高质量产品“挤出效应”以及对低成本实体经济需求的“扩张效应”。三是要处理好国际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要坚持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再创新、原始创新相结合,在扩大开放基础上交流融合创新,推进中国工业沿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转型升级②。

四、中国工业化进程对全球化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号召下,中国工业化进程对全球化的影响日益深远。

一个大国的工业化进程会产生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效应。从国内看,在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驱动下,该国的工业化进程逐步深化,生产方式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进而推进交换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变化以及城市化的进程,这在经济上最终表现为该国快速经济增长和深刻的经济结构变化,从而促进该国的经济现代化的实现;从国际看,在工业化深化过程中,生产方式变革还会导致该国生产的市场边界不断扩大并走向国际化,这加速了产品贸易以及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国际流动,在全球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格局,最终表现为对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在上一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成功推进了低成本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够找到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产品,中国对全球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逐步推进, 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工业化对全球化的贡献将不仅主要停留在基于中低价值链环节的全球分工格局下的低成本产品出口,而是将会表现为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面国际流动,也就是产能的国际合作。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可以理解为全球化的一种全新理念。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合作框架下,中国将与接受“一带一路”理念和倡议的国家通过政

① 黄群慧. 振兴实体经济要着力推进制造业转型[N]. 经济日报, 2017-02-10.

② 黄群慧. 着力提升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N]. 光明日报, 2017-02-07.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互通互联"，进一步带动工业产能合作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更广、更深层面的区域经济合作。

工业产能合作是中国工业化发展到后期阶段的新的合作方式，会对推进全球化进程产生新的巨大影响。所谓产能合作可以理解为在两个或者多个存在意愿和需要的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产能资源跨国或者跨地区配置的活动。产能合作的合作机制一般表现为在政府达成"互联互通"、多边合作共识国际规则的前提下，借助多边投资机制，基于产业互补性推进的企业和项目合作。从现有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案例看，合作项目多是具有基础设施投资性质的、对项目所在国民生有巨大贡献的重大战略性意义的工程。

从工业化视角看，"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表明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在产生更大的"外溢"效应。基于最初倡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至少涉及到包括东南亚、中亚、中东欧等地区的 65 个国家（中国包括在内），覆盖约 44 亿人口，经济总量约 21 万亿美元，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球的 63%和 29%。"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这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也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我们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之间工业化水平差距较大，处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国家只有 1 个，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国家有 14 个，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国家有 16 个，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的国家有 32 个，而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国家只有 2 个；有 14 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高于中国，有 44 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低于中国。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工业化水平处于上游的位置①。因此，中国的工业化经验将对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形成了不同的优势产业类型。而这些产业也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梯度，即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工业化后期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工业化中期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业化初期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产业合作空间巨大②。通过产能合作，中国将会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这对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意义巨大。如果说，长期以来，中国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主要表现为以提供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产品为主，那么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国也将给全球化带来合作方所需要的一体化的服务方案，这意味着中国对全球化的影响更为深远。

〔责任编辑：许明〕

"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成本与收益

李向阳

中国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经历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过程，目前正在面临充当引领者的选择③。在"反全球化"的背景下，充当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全新的议题。本文

[作者简介] 李向阳（1962—），男，河南内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① 黄群慧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② 黄群慧等. 论中国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中国工业经济，2016，(9)：5–23.

③ 目前在中国官方文献中没有对"引领经济全球化"或"引领全球化"做出确切的定义，尽管这一表述被广泛地使用。本文所使用的"引领"不是简单的参与、支持或推动，而是指牵引、制动与控制方向，因此，"引领者"大致等同于"领导者"。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试图考察引领全球化的成本—收益,以期对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前景作出评估。

一、“反全球化”的兴起及其发展方向

国际范围内的“反全球化”始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占领华尔街”运动曾一度风行于许多发达国家,其目标直指大型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及其政府的救助措施。2016 年以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反全球化”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否定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理念。经济全球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体现为商品、服务及生产要素(资本、技术、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另一方面体现为制约上述跨国流动的规则与秩序。如果说前者反映的是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属性,那么后者反映的则是它的生产关系属性。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理念是,自由贸易有利于全球福利水平的提高,而特朗普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口号“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是对上述理念的彻底否定。在他们看来,进口、对外投资或外包等同于本国工作机会的丧失,只有出口与引进外国投资才有利于本国①。这是典型的重商主义理念。二是退出(或威胁退出)支撑经济全球化的载体。英国已经决定退出欧盟;特朗普政府执政伊始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就已经生效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开展重新谈判,甚至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三是拒绝提供公共产品。大国提供公共产品是经济全球化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些公共产品主要表现为制约商品、服务、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的规则与秩序。长期以来,美国(及其盟友)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因此,它是经济全球化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目前,特朗普政府拒绝(减少)提供公共产品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从多边主义转向区域主义,进而转向单边主义;公开倡导保护主义;颁布“禁穆令”;修建美墨隔离墙;退出全球气候变化公约,等等。

“反全球化” 运动的兴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对其收益分配格局的不满。在国家间分配层面,“反全球化”者认为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的相对受益者,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相对受损者。经济全球化使所有参与者获益,这一点没有人质疑。问题在于,他们认为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获益更小。过去二十余年间,无论是依照经济规模份额、贸易份额、国际资本份额,还是依照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力,发达国家都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在发达国家不同产业间分配层面,金融与高技术产业是主要获益者,而传统产业则是受损者。在这种意义上,华尔街与硅谷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是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相比之下,硅谷并不是美国公众指责的焦点,因为它毕竟是美国引以自豪的象征。在发达国家不同群体间分配层面,资本和技术是主要获益者,而低技能劳动力则是受损者②。从上述利益受损者的分布可以看出反全球化的主要来源,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出 2016 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支持者的分布格局。

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立场是否意味着美国要退出全球化呢?答案是否定的,根本原因在于

① “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并非是特朗普本人对经济全球化的认知,而是反全球化者们的共同认知。目前,它已经成为国际范围内反全球化的共同口号,如法国的反全球化者提出“买法国货,雇法国人”的口号,荷兰的反全球化者提出“买荷兰货,雇荷兰人”的口号。同时,在美国国内,多数人对此也有认同感。不久前,美国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皮尤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就业机会的丧失主要来源于外包和进口,对此持认同立场的被调查者分别占 80%和 77%,位居八项因素中的前两位。参见 The State of American Jobs [EB/OL].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6/10/06/the-state-of-american-jobs, 2016。

② 麦肯锡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在 25 个发达国家中,有 65%—70%家庭的实际收入在 2005—2014 年间没有变化,甚至还下降了。中低技能水平是这些家庭的一个重要特征。参见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Poorer Than Their Parents? Flat or Falling Incomes in Advanced Economies[R]. Mckinsey&Company, 2016。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美国不会放弃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利益，更不愿意放弃作为全球霸主所带来的利益。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1950—2016 年间美国来自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与运输、通讯技术改进）的收益大约为 2.1 万亿美元；相应地，美国人均 GDP 与每个家庭的 GDP 因此而分别增长了 7014 美元和 18131 美元。预计到 2025 年贸易自由化给美国带来的潜在收益将达到 5400 亿美元；相应地，人均 GDP 与每个家庭的 GDP 将分别增长 1670 美元和 4400 美元①。特朗普执政后，尽管以往美国政府所追求的许多理念和目标都被放弃了，但他不会放弃作为全球霸主的目标②。"让美国再次强大"就是这种理念的具体体现。在特朗普政府看来，美国以提供公共产品为代价却没有从经济全球化（多边贸易体系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获得预期的收益。未来需要发挥美国的比较优势，转向双边贸易协定谈判，获取更大的利益。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实际上是要重新构建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而不是要完全退出全球化。换言之，所追求的是"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而不是"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

二、中国引领全球化的成本—收益分析

国内外要求中国引领全球化的呼声来自于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作为全球经济的霸主，美国从全球化的主导者转变为"反全球化"的引领者；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上升开始具备引领全球化的条件。由中国引领全球化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是一个全新的议题，对此我们首先需要评估其成本与收益，进而才能对引领全球化的方式和途径做出符合实际的选择。

理论上，引领全球化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或主导权。对于正在崛起中的中国而言，引领全球化的收益大致可分为三类：①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需要。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发展历程证明，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这突出表现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开始从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障碍就是规则约束。现有的规则是由处在价值链顶端的发达国家所制定的，反映的是技术领先者的利益诉求。换言之，现有规则的核心目标是维护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次不能改变。因此，中国要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就必须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需要。近代以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寥寥无几，这固然有国内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不足的原因，但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制约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被"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水平链条上。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全球治理的"发展缺位"。为此，中国需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弥补其"发展缺位"。③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要打破"修昔底德陷阱"，不依靠战争手段挑战守成国的地位。因此，扩大对国际规则与秩序发展方向的影响力是必然选择。

引领全球化在获取收益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在当今"反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而言，不仅需要承担充当引领者的固有成本，而且还要承担额外的成本。①充当引领者需要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是供给不足，这就需要引领者提供。比如，在战后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美国并不要求其他国家做出对等的开放市场承诺，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单方面的市场开放。世

① 针对欧盟 27 国和其他 13 个发达国家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参见 Hufbauer G. C., and Zhiyao Lu. The Payoff to America from Globalization: A Fresh Look with a Focus on Costs to Workers [R]. Policy Brief,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② 李向阳. 特朗普政府亚洲政策及其影响[A]. 2017 年亚太蓝皮书[C]. 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贸组织(及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多数规则中都有对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即便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中,通常也有类似的安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缺乏对等开放市场的能力。经济全球化所需的公共产品并不限于贸易领域,在金融、投资、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甚至包括安全领域也同样需要大国(引领者)提供公共产品①。②引领新型全球化的成本。与既有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中国引领的全球化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其目标是要克服既有经济全球化的弊端。这种新型的全球化是一种均衡、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体现了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特征,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当然,新型全球化目前还处在理念阶段,难以对其构建与运行成本做出确切的判断。然而,与既有的全球化相比,引领者需要承担的成本将会更高。理论上,为实现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要求,引领者需要承担更高的规则制定成本、协调组织成本、利益让渡成本。③引领者需要承担反全球化所引发的额外成本。战后美国主导全球化的国际背景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以苏联东欧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独立于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换言之,前者的存在对后者不构成额外的负担。冷战结束之后,统一的世界市场形成,多边贸易、多边金融体系涵盖了几乎所有国家。相比之下,目前经济全球化处在十字路口,美国从全球化的主导者转变为反对者,其他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思潮也在暗流涌动。如上所述,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全球化的收益(甚至不想放弃全球霸主的权利),而只是不想承担主导全球化的义务。在这种意义上,美国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搭便车者。比如,特朗普政府在“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旗号下,开始放弃向世界单方面提供出口市场的责任,要求对美国有逆差的国家单方面承担纠正贸易不平衡的义务;倡导所谓的“公平贸易”或“对等贸易”;拒绝在多边机制内列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倡议;宣布退出 TPP,转向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指责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不公平;退出全球气候变化协定,等等。这些都无疑增加了中国引领全球化的成本。

针对中国引领全球化的收益与成本迄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无法做出相应的量化分析,更不可能对收益与成本进行比较。不过,从中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引领全球化的成本比当初美国主导全球化的成本更高;如何有效地降低成本是中国成功引领全球化的关键所在。

三、中国引领全球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引领全球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一是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反全球化”在绝大多数国家并非社会主流认知,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通过参与全球化获得发展的机遇。二是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而现行的全球治理无法完全应对,克服“全球治理赤字”要求大国承担责任。三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客观上具备了引领全球化的条件。

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承担引领全球化的重任,尽管其路径还在探索过程中。

(1)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理念。应对“反全球化”的挑战,引领新型全球化首先需要理念的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中华文明和中国外交实践,契合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有着适应时代发展的深刻丰富的理论内涵。其核心是合作与共赢,基本原则是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目标是包容与可持续发展②。“反全球化”浪潮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全球化收益分配的零和博弈:把外国的收益视同为本国的损失,把本国进口与

① 以市场开放为例,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市场,目前与 101 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2000 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多边贸易逆差累积了 8.6 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总额为 8.3 万亿美元。参见史蒂芬·罗奇.贸易逆差:特朗普心中的 101 根刺[N]. 金融时报, 2017-03-09。

② 李向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全球治理改革的方向[N]. 人民日报, 2017-03-08.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对外投资视同为就业机会丧失，把外国产业的壮大视同为本国产业的衰落。其结论必然是"反全球化"。在这种意义上，合作与共赢可以说是应对反全球化的良药。当今"全球治理赤字"就源于责任与利益的不对称，因此，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有助于消除这种不对称。至于包容与可持续发展，则要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治理的"发展缺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均衡、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全球化表明中国已经开始为引领全球化提供理念的创新。

(2)共同维护和改革多边贸易体制。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是多边贸易体制，只有多边贸易体制才能够保证商品、服务及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战后，美国主导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制度基础。这种多边贸易体制的背后是国际经济规则，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背后是保证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一整套规则；世界贸易组织所涵盖的规则不断在扩展，从最初的以消除"边境壁垒"(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的减让)规则为主逐渐扩展到以消除"边境后壁垒"规则(如环境保护、劳工权利、政府采购、产业政策等)为主。实践证明，战后确立的多边贸易体制对促进经济全球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化，新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多边合作机制开始扩展到外太空、极地开发、温室气体减排、互联网与大数据等领域。与此相对应，中国也从国际经济规则的旁观者发展成为遵守者与参与制定者。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现行的多边体制、国际经济秩序及规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没有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民主赤字"就是突出表现。因而，中国引领全球化既需要维护多边体制的稳定性，又需要推动其改革的进程。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经过新兴经济体的共同努力，他们所占的份额与投票权已经有所提升，人民币也被纳入到特别提款权的一揽子货币之中。

(3)推动开放的区域主义。区域主义是相对多边主义而言的。如果说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多边主义是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的话，那么，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代表的区域主义是否能够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则存在不确定性。区域经济一体化从低级到高级可以分为多种形式，即使是最低级的自由贸易区协定通常也要求成员国之间取消关税，这要比多边贸易机制(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化程度更高。至于其他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其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更是多边贸易机制不可比的。在这种意义上，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然，区域经济一体化只是在特定范围内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换言之，它是有边界的，有进入门槛的。这客观上又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史上，经济全球化陷入低谷时期(如大萧条阶段)，全球经济通常会被相互独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所割裂。这就像互不联系的岛屿一样。只有当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具有开放性特征时，它们才会成为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动力。美国经济学家巴格瓦蒂把区域主义的开放性称为能否促进多边主义的标准：开放的区域主义会成为多边主义的"跳板"(Building-blocks)，而封闭的区域主义则会成为多边主义的"绊脚石"(Stumbling-blocks)①。现实中，大国所倡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通常都宣称具有开放性，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完全具有开放性，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进入门槛。中国参与并致力于推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除了双边机制外，主要有两个：一是以 APEC 为基础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二是以亚洲和大洋洲国家为主的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前者是在 APEC 北京峰会上由中国所倡导的，后者以东盟为核心。尽管这两者尚不具备完全开放性，但在目前"反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快其谈判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

(4)构建新的合作平台。现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也包括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合作机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规则导向。参与者事先不仅要确定进入门槛规则，而且还要制定出各国的权

① 世界银行. 2005 年全球经济展望：贸易、地区主义和发展[M]. 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利、义务及争端解决规则。这就必然会降低他们的开放性。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则不然，它是以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①。这种发展导向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①它以古丝绸之路为纽带，继承并发展了丝绸之路精神，充分体现了开放性特征。②它以互联互通为基础，这有助于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瓶颈及其相互合作面临的制约。③多元化合作机制使其有别于所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治理结构，从而适应了沿途国家的多样性、差异性。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既有自由贸易区，也有次区域合作、经济走廊、产业园区，等等。④义利观是它的一个突出特征。“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体现了中国作为倡导者的担当。⑤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是其最终目标②。“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决定了它不是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替代，而是对其补充。例如，它可以与现有的自由贸易区（如东盟）对接，与关税同盟对接（如欧亚经济联盟）、与政治经济一体化联盟（欧盟）对接，也可以与单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如蒙古的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

美国对经济全球化的立场发生逆转为中国引领全球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中国引领全球化的成本。作为和平崛起的必经之路，中国引领全球化既非要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缺”，也非要复制美国充当霸主的模式。原有经济全球化存在的诸多弊端与美国的霸权模式有着必然的联系，因而中国所引领的全球化必然是新型的全球化，不可能复制原有的模式。鉴于新型全球化的目标和引领全球化的成本，联合其他大国共同引领全球化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责任编辑：覃毅〕

“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制造业振兴

刘志彪

习近平总书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深邃思考和务实推动，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世界担当和情怀，也是中国面对“逆全球化”复杂局面，更新全球治理和发展机制、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简称 GVC）的最重要的决心和措施。这一倡议对于启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有助于中国在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中，重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可以在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推动形成中国制造发展的优良环境和氛围，从而抓住世界赋予中国的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向东开放：嵌入 GVC 带来增长机遇和挑战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尤其是 2001 年加入 WTO 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指向特征主要是向东开放，发展的内外联动机制，主要表现为企业主动嵌入由西方跨国公司主导的 GVC，接受其发出的制

[作者简介] 刘志彪（1959—），男，江苏丹阳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① “一带一路”是否属于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在学术界存在严重的分歧。一种看法是，“一带一路”本身就属于多边合作机制，甚至把它等同于新型的经济全球化，比如，把它称之为经济全球化的 2.0 版本（或 2.0 plus）、3.0 版本等；另一种看法是，“一带一路”尽管具有开放性，但它并不能归入多边机制，更不能等同于经济全球化。本文不打算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② 李向阳. “一带一路”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出路[J]. 国际贸易，2017，(4)：4-9.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造订单进行国际代工。我们把这种全球化发展现象称之为"嵌入 GVC 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①。它有五个基本的内容：一是在收入较低、内需市场较小的初始条件下，直接把支撑国内增长和发展的拉动力转向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上；二是利用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尤其是物美价廉的劳动要素，结合所引进的西方技术，进行初级产品的生产加工活动②；三是通过营造优惠政策的"洼地"效应，形成局部优化的投资环境，建设各类经济开发区，广泛吸收外资，让外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业务；四是在GVC 的底部，从事加工、制造、生产、装配等相对较低的附加值业务③；五是在经济政策取向上，运用各种激励措施推进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战略，等等。

制造业的全球化发展，使中国作为主要的生产国取得了巨大的红利。具体体现为：一是为中国企业发展提供了利基丰厚的市场，为大量的过剩劳动力提供了比较利益显著的就业岗位；二是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出清，由此吸收了中国丰富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过剩产能；三是中国企业在国际代工中虽然处于 GVC 中的"被俘获"地位，但是逐步实现了产品升级、工艺（流程）升级，甚至一定的功能升级；四是通过参与国际竞争，中国本地企业不仅学到了技术，也学到管理技能和各种知识，逐步掌握了玩转世界市场和创建独立品牌的微观基础。

嵌入 GVC 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 GVC 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了一些挑战。主要是：

第一，容易出现较大规模的产能过剩问题。进入壁垒低、替代者众多、竞争异常激烈，是处于"微笑曲线"底部位置的市场结构的基本特征，由此决定了在世界经济景气时期，蜂拥进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容易在市场需求高峰退潮的时期形成过度竞争态势，加剧严重的经济萧条。

第二，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忽视产业更新和技术升级。国际代工生产具有技术难度小、回报率相对较高、市场风险相对较低的特征，这会诱使企业放弃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活动，从而放缓甚至放弃产业升级的艰苦努力。现在随着国内外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中国企业过去低价竞争的利器优势正不断地消失，逐步让位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企业生产率的提升速度，也难以消化这种成本上升的压力，从而导致竞争力衰减。

第三，容易抑制自主创新的发展。在国际代工中，企业做的是发包方即西方跨国公司早已研发、设计好的外包订单，不仅中国企业无缘于这种产品的设计、研发活动，而且所收取的"合理"的加工费以及所获得的"合理"的利润会让中国企业产生"温水煮青蛙"的效应，逐步失去产业创新升级的欲望。另外，进入这种代工体系，也容易被跨国企业所"俘获"，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为技术创新升级设置人为的障碍④。

第四，容易出现严重的收入分配失衡。一是处于 GVC 低端的中国企业，缺少与市场势力巨大的发包方进行讨价还价的必要资源，只能获取微薄的加工费；二是在资本密集产业中，如果所有者为外资，那么按照既定的分配规则，主要的利润将自动为发达国家所占据⑤；三是低端制造业的过度进

① 刘志彪. 经济国际化的模式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选择[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8)：11-17.

② 黄永明，何伟，聂鸣.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的升级路径选择[J]. 中国工业经济，2006，(5)：56-63.

③ 文嫣，曾刚.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发展——地方建筑陶瓷产业集群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04，(6)：36-42.

④ 刘志彪. 中国贸易量增长与本土产业的升级——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视角 [J]. 学术月刊，2007，(2)：80-86.

⑤ 这能解释为什么吸收 FDI 多的地区，如苏州，其本地 GDP 中工资含量低。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入，会导致压价竞争，恶化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地位。

因此，中国过去攻城掠地、无坚不摧的制造业附加值贸易活动，目前到了必须转换发展模式的关键阶段。

二、全球价值链重构与经济结构失衡的纠偏

调整、扬弃单一的出口导向的全球化战略，重构 GVC，塑造中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建立立足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良性循环的视野和机制，既是均衡国内经济结构的要求，也是中国为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纠偏所做的重大努力。

2016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这种结构性失衡问题，一方面表现为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表现为高质量的有效供给不足。究其原因，是中国相当多的产能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面向外需以及国内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在那个时期大力实施了嵌入 GVC 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面向中低端市场出口形成了巨大的产能。在应对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因放水刺激，一些产能又有所扩大。现在全球经济陷入了低增长困境，国内的需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随着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中高端消费需求显著增加，早先的低端产能就变成了过剩产能。如果不能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中高端需求将基本转向国外市场。更深刻的是人口结构变化，2012 年以来中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使住房、小汽车、家用电器、食品、服务等消费需求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此，如果供给端的结构性改革跟不上，技术创新失去了国内市场的支持和推动，那么，中国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上，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纠偏“重大结构性失衡”的关键之一，是要从扬弃“基于嵌入 GVC 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入手，塑造激励产业转型升级的环境和氛围。一方面，压缩低端产能，把调整出来的市场资源、信贷资源、物质资源，通过市场机制源源不断地转移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另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实施品牌战略，增加高质量有效供给，满足国内不断崛起的中产阶层的中高端需求，使中国制造从数量扩张全面转向质量提升。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

从中国为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纠偏的角度看，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态势下，上述国内经济结构的纠偏和调整，还有助于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恢复动态均衡。过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 GVC 分工秩序和结构中，获得了大量的主要来自于中国供应链上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其作为高技术生产国，其技术设备等则从中国市场的迅速成长中，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和实际利益。不过这种分工秩序和结构在长期中是动态非均衡的，随着中国逐步成长为名列全球前茅的最大经济体，如果长期满足于为西方跨国企业国际代工，不面向不断成长的国内市场需求，不进行产业的功能升级，必然会使全球经济结构发生重大的失衡。

之所以说中国的这种全球化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是因为这一分工结构和秩序除了会使中国无法解决严重的产能过剩等问题外，还会使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一定程度的利益结构失衡。如中国廉价产品的长期大量输入，会使这些国家的同类产业，尤其是中低端产业逐步丧失竞争优势，出现大面积的产业转移或外移，出现所谓的“产业空心化”趋势①；也会使以传统农业和一般制造业为代表的

① 胡立君，薛福根，王宇. 后工业化阶段的产业空心化机理及治理——以日本和美国为例[J]. 中国工业经济，2013，(8)：122-134.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旧经济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受到损害，出现利润下滑、工厂倒闭、失业率增加和社会不稳定等现象。这就是当今"逆全球化"思潮出现的全球分工秩序和产业基础。

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经济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应该争取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放大正面联动效应，防止和减少负面外溢效应。为此，他提出了以"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全球治理的命题，以此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向着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其中，"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会改变，但是全球化的形式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趋势，目前至少已经出现了以下四个明显的变化：①出口商品为主，正在演变为投资与贸易一体化，即输出资本带动商品就地销售；②吸收外资为主，正在演变为吸收先进技术和高级人才为主；③利用别人的市场支撑自己的经济增长，正在演变为利用自己的市场进行全球化扩张；④以建设科技园区、制定优惠政策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正在演变为提供先进的制度平台和硬件载体来吸纳高级技术人才。可以断言，中国将会高举经济全球化的大旗，以"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GVC，用自己对全球化的理解，形成自己独到的全球化战略体系，包括一套完整的战略理念、模式、体制和举措，等等。

中国新的全球化战略也正在崛起。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GVC深度重塑，都给经济全球化赋予新的涵义。未来随着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的重振，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协调的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将会建立。在G20安塔利亚峰会上，各成员国所倡导的建设包容的GVC，就是为了构建这种新型的GVC治理体系。对于有担当、负责任的中国政策决策机制来说，包容的GVC就是要主动构建全球经济增长结构均衡的新机制，就是要构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的新战略。

三、沿"一带一路"倡议重塑全球价值链与振兴中国制造业

如果说过去基于出口导向嵌入GVC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话，那么，重构基于内需的GVC就是中国参与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战略的主要含义①。提出这个战略的主要目的，不是主张要回归封闭经济，不是说可以关起门来自力更生搞建设，或者搞什么进口替代，而是要用开放、包容、协调的理念，扬弃过去单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利用自己内需规模名列世界前茅的优良基础条件，承担起自己作为发展中大国相应的责任，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为契机和基点，构建以我为主的包容性GVC治理体系，以此促进全球经济的结构均衡，促进中国经济内生化发展，并通过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和发展，加快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中国参与新一轮全球竞争的新的动态竞争优势。

建设制造强国需要一个很好的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不仅要从贸易方面着力，更要从生产和贸易一体化的角度上考虑环境和机制的优化②。过去在GVC底部进行国际代工，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大国，现在要寻求建设制造强国的环境和机制，需要在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治理上有所作为，需要建立

① 刘志彪. 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2)：51-59。刘志彪. 战略理念与实现机制：中国的第二波经济全球化 [J]. 学术月刊，2013，(1)：88-96。

② 刘志彪，吴福象. 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基于经济全球化两个重要假说的实证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06，(2)：80-92.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以我为主的包容性 GVC。

“一带一路”倡议是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中的一种全新的空间开放观，它是一种开放格局，而不是一个地理规划。与这种开放观有机配合的，是要有意识地去构建牢固的 GVC 连接，使不同国家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形成相应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这是全面呼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微观经济基础。否则，国家之间不可能形成各种有机的经济技术联系，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利益纽带来维系互联互通的产业基础和文化。

与过去全球化中向东开放的空间指向特征不同，在西南开放的“一带一路”倡议下，构建以我为主的包容性的 GVC，在发展上具有下列五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积极构建以我为主的包容性 GVC，加快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鼓励中国企业努力从事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网络品牌、物流金融等非实体性高端服务业活动。二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要通过对 GVC“链主”地位的掌控，以及在价值链中的微观治理机制，来向世界输出中国丰富的、具有竞争力的资本和产能。同时，也要通过 GVC 大力引进世界的能源及资源。三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我们可以背靠国内巨大的内需市场，利用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张的优势，形成制度化的“虹吸”全球高级、先进生产要素的平台，为产业迈向中高端服务。即一方面可以走出去收购和兼并优质资源和技术为国内市场竞争服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设世界级城市形成要素的虹吸功能，向世界各国引进我们急需的知识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四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我们可以用“逆向发包”原理和机制①，在相关业务发包中，把一些先进国家的知识、技术和人才有目的地为我所用，让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跨越地理障碍，优先进入中国经济的运行轨道，并为中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服务。五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中国企业在内需引导下，通过比较优势的选择，逐步把“汗水经济”转化为“智慧经济”，形成新的全球产业分工或产品内分工格局，使中国从 GVC 低端的成员，成为全球创新链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一条崭新的以我为主的包容性 GVC，将成为中国高水平全方位开放的新空间、新纽带和新载体，是中国经济增长实现中高速、产业发展迈上中高端的基础。显然，沿“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的基于内需的 GVC 也会极大地影响中国制造业的振兴和发展进程，它将助推经济加速进入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从而给中国制造安上“聪明的脑袋”和“起飞的翅膀”。

在这种新型的全球化战略中，制造业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发展机制和基本路径，跟过去在 GVC 底部进行国际代工的方式有本质的不同，具体表现为：一是要在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力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体制，扩大内需。短缺经济时代主要是提高生产能力；现在是过剩经济时代，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实现消费的基本现代化，是用内需支持现代经济增长的最坚实的基础和条件。二是要在不断壮大的、巨大的内需的基础上，大力推进资本市场中的兼并收购和资产重组活动，以此组建中国的巨型跨国企业，成为以我为主的包容性 GVC 中的“链主”。对于一些具有国际市场知识以及资金优势的企业，可以鼓励其到国际资本市场去并购外国企业，并把收购后的企业的人力和技术转为为国内市场开拓和竞争服务。三是以“一带一路”战略为依托，在国内重要的全球性城市建立总部基地，占据 GVC 的“链主”地位。同时，要在沿线主要城市建设 GVC 的节点关系，以此转移中国具有竞争力的丰富产能，把一些发展中国家纳入中国主导的价值链体系。四是除了发展消费者驱动的 GVC 外，还要加入全球创新分工体系，即全球创新链，发展生产者驱动的 GVC②。其中，有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实施最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二是建立面向制造

① 张月友，刘丹鹭. 逆向外包：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新战略[J]. 中国工业经济，2013，(5)：70-82.

② 刘志彪. 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力[J]. 学术月刊，2015，(2)：5-14.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强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前者必然激励创新驱动，后者将重塑工匠精神，提供振兴制造业的高级技能人才。

四、振兴中国制造业的若干政策建议

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是党中央、国务院明确的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当代中国，加快产业升级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大踏步地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根本法宝。因为只有不断地依靠技术进步和各类创新，不断地提升产业的生产率，才能克服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才能降低产业产出的单位成本，使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才能奠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我们应该顺应"一带一路"倡议下 GVC 重构的趋势，通过加快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快优化中国制造发展的环境和氛围，抓住世界赋予中国的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和机会。这里提出以下具体的对策建议：

(1)在实虚的关系上，要坚决抑制虚拟经济利润率长期过高的不良趋势，让实体经济企业能够获取社会平均利润率，让创新企业获取超额利润。这是实体经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更是走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基础条件。为此，一是要加快民营企业对银行业的进入速度，打破现有银行的融资渠道垄断；二是适当增加一、二线大中城市的土地供应，加大这些城市对现有土地的开发强度，缓解房地产价格上涨趋势；三是在资本市场上把不良企业的退出与新进入的首发企业挂钩，从而抑制资本市场泡沫。

(2)在供求的关系上，应主要利用竞争政策、环保政策而非行政手段去过剩产能，通过资本市场鼓励产业内的优势企业收购兼并，增加制造业企业集中度，强化其调控市场价格的能力。过去中国是资本短缺、商品短缺的"双短缺"经济，现在是资本过剩、商品过剩的"双过剩"经济。前一环境下，产业升级要用产业政策，以推进产能迅速增长；后一环境下，促进产业升级要用竞争政策。如多用补贴用户和消费者的政策，少用或不用补贴生产者的政策；要保护竞争，但不保护竞争者；要在去产能中救劳动者，但是不救僵尸企业，等等。

(3)在内外的关系上，要构建有利于外资和民营企业投资发展的法治化市场营商环境，进行产业升级的长期预期管理。产业升级是长期的投资行为，需要稳定投资者的长期预期。为了增加外资、民资等实体经济企业的投资信心，必须坚决地遵守过去给予的优惠政策的承诺，甄别纠正一批侵害民营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保护和支持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精神。

(4)在新旧的关系上，在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的同时，运用一切手段，鼓励传统产业中的企业在经济周期的底部阶段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如对购进国内外先进技术设备的企业，可以在一次性全额作为"进项"抵扣的基础上，按 1—2 倍的比例进一步给予优惠税收鼓励，以及实施技改全额贴息，等等。

(5)在劳资的关系上，应该看到，技术工人是中国制造业的顶梁柱，是中国制造的未来，必须大幅度提高制造业中技术工人的待遇，实施首席技工制度，并鼓励他们持有企业的股份，跟企业共命运、同成长。要大张旗鼓地表彰中国制造业中为国争光的各类品牌企业、优秀企业家，对在国际竞争中胜出的企业设立"中国工匠"的表彰制度。要大幅度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把一些优秀的大学改造为职业技术大学，对其实施类似"211"大学或者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而不是让办学水平较低的"三本"院校转制为职业技术学院。

(6)在费税的关系上，当前为企业大幅度减税的空间并不存在，可以降低的主要是各种企业费用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如融资成本、高额的社保负担、不必要的额外的各种收费支出负担，同时要坚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决打破民营企业的进入壁垒。

(7)在宽严的关系上,应该看到,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是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中国应尽快实施严厉的知识产权、专利保护法治,坚决打击各种名义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激励制造企业加大自主知识产权的投资,尽快形成核心竞争力。

〔责任编辑:许明〕

全球化新时代的中国产业转型升级

金 碚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十字路口:由于经济复苏缓慢,各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形势严峻,有些国家甚至陷入困境,加之全球治理和安全形势面临极大挑战,所以各国都在寻求应对之策,包括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调整。这直接涉及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政策抉择,是继续促进全球化还是转向"逆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世界舆论焦点。当前,人类发展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时期(世界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大多数人口还在盼望进入工业化社会),而工业化必然要求经济全球化,实行自由贸易规则。但是,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同,而且,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又各具特点,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如何变革制度,调整政策,以应对挑战,也会有不同的观念、思维和立场。在这样的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也需要有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

一、产业转型升级的全球化背景

人类发展漫长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开启的工业化进程,将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卷入其洪流之中,从供给推动与需求拉动两方面发力,实现人类历史千万年未曾有过的现象:高速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大量涌流,彻底改变了人类发展轨迹——市场经济兴盛、工业化不断扩张、全球化不可阻挡。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 1.0 时代,19 世纪到 20 世纪中叶,中国国运衰落,曾经的世界第一大国,被工业化潮流甩弃,沦为"东亚病夫",几乎成为工业化列强国家的殖民地。20 世纪中叶,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 2.0 时代。这一时代的前半段,即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世界经济分为以苏联为霸主和以美国为霸主的两个经济一体化世界,可以称为"半全球化"或分裂的全球化时期。而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以美国为霸主的全球化一揽天下。在这一全球化 2.0 时代,中国寻求复兴之路,起先"一边倒"地归入苏联主导的"半球",而从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毅然决然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半球"接轨。当 20 世纪 90 年代两个"半球"并流为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后,尤其是 21 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开始发生了极大变化。特别是,世界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完全是"旧貌换新颜"。经济全球化迈入了新时代。①

[作者简介] 金碚(1950—),男,江苏吴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① 金碚. 论经济全球化 3.0 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1):5-20.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全球化新时代的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产业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展，经济体量大幅增大，建设能力惊人增强，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全球的经济大国作用。同时，世界经济也面临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增长"平庸"态势。一方面，发达国家作为产业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作用减弱，特别是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甚至发生产业"空心化"现象；另一方面，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扩张，实行平推式工业化战略，以低成本替代方式大规模获得"低垂果实"，占据产业"开阔地"，导致相当一部分产品的市场饱和，以致出现"产能过剩"问题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这样，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都面临着迫切的产业转型升级课题。发达国家希望重振制造业，实行再工业化；中国也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振兴实体经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更广泛深入地加入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实现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强盛。可以说，在全球化新时代，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课题。

当然，虽然同为产业转型升级，但各国所处的具体国情和国际环境是不尽相同的，所以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各有差异。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后发经济体，大国、小国，沿海国家、大陆腹地国家，情况千差万别。而且，各国经济开放的现状也很不相同，有的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已经相当高，有的国家尚处于正在迈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对于全球化的态度甚至立场和应对策略也必然会有各自不同的选择。所以，不可能强求各国对经济全球化的一致态度，也没有必要机械地将不同的观点、立场和对策，截然划分为赞成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的两类。在现实中，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两极之间有无数种中间状态。全球化虽然是一个大背景，但在此背景之下，各国有理由和权利选择适合自己具体国情的产业发展路径。

二、"逆全球化"现象与世界产业竞争力格局演变

从理论上说，经济全球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但工业化与全球化也并非完美无缺，在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总是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人类为此也难免付出各种代价，有些代价还可能相当沉重。因此，"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从来就是全球化的伴生现象。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反全球化"通常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国家的主张，美国、德国等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期也曾实行过反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产业竞争力较强的国家则更倾向于主张推进全球化政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由于经济全球化 1.0 和 2.0 时代，列强和霸权国家将掠夺殖民地和控制后进国家（甚至颠覆其政权）作为推进全球化的方式，具有强烈的汲取性，所以，后进国家出于保护民族产业和避免利益受损的意愿，往往采取抵制全球化和实行保护政策的方式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

中国工业化走的是一条具有特色的道路。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相当长一段时期实行强烈的封闭政策，同全球化隔绝，因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 1.0 时代遭受工业国列强的欺辱，留下深刻的民族记忆。而在经济全球化 2.0 时代，在由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贸易规则下，中国等后进国家处于明显的不公平地位。当时，我们非常担心，如果融入全球化，是否会吃亏，甚至丧失民族经济独立自主的地位？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终于彻底明白，拒绝全球化就是放弃发展机会，反对全球化绝不可能长久保持经济自立，反而可能因落后而被"开除球籍"，所以，勇敢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是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1 世纪初，中国以接受非常苛刻的条件为代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结果是因此而深受全球化之益，经济高速增长，生产能力大幅扩张，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了比肩之势。

此时,一些曾经的自由贸易主张国和全球化规则主导国反而开始犹豫了,感觉自己是否走得有些“过头”了,或者是不是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太“宽容”了？于是,全球化新时代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主张,甚至在一些领域实行反全球化政策。当然,这里所说的“一些发达国家”准确地说是发达国家中的一些人,这些人的主张开始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产业竞争和国际贸易的局部领域还只是打着维护自由贸易的旗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例如利用反倾销、反补贴条款,对中国进口产业施加贸易壁垒,而是发展到公开扯起反全球化的旗帜,声称就是要阻止对其不利的全球化趋势,并且还能得到国内许多民众的支持,甚至成为实际政策,例如英国脱欧等。

我们仅仅将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视为民粹主义抬头,是不够的。其实,这一现象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即当代世界产业结构及国际竞争力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尽管在总体上还处于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的状况,但是综合竞争力已经有了极大提升。特别是,由于国际产业转移所导致的发达国家产业生态的高端专业化,反而削弱了其产业丰厚度,即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配套性减弱;而中国尽管在产业的高端技术上尚弱,但产业的丰厚度大大增强,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配套性非常强大,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很大优势,甚至让工业发达国家望而生畏。

另一种情况是,由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所导致的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挑战,例如移民以及同其有关联的国际恐怖主义蔓延等,也使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产生难以承受其社会压力的困惑,因而倾向于出“逆全球化”之下策,来应对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关门避险”似乎是一个高招,实则为一个损招;表面上是一步“妙棋”,实际上是一着“臭子”。当然,之所以出此损招和“臭子”,毕竟有其为难之处,即如何在世界产业竞争力格局演变的新态势下使本国产业仍能占据有利位置,以及如何在全球化新时代进行有效的国家经济和社会治理,以至全球治理。而且,如前所述,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并无绝对界限。脱离了具体国情,很难判断国门应该开多大才最好,只能说完全关门和完全敞开,都不可取,实际上也没有这样的国家。就如同火车站,是像中国这样至少检两次票才能进站上车更好,还是像英国那样不用检票就能进站上车更好？或如同大学校园,是像中国大学这样用围墙围起来并严格门卫好,还是像美国大学那样没有围墙更好？这就是一个具体国情中的有效治理或可行治理的具体制度安排问题。对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很大程度上与此类似。

三、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思维

在全球化新时代的世界产业竞争力格局新态势下，中国也面临着同其他国家相类似的两大课题: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和进行有效的市场经济秩序治理,以引导经济发展在市场机制调节下,走向合意的方向。

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各种要素的可迁移性大大提高,任何企业、地区和国家,都要采取有效方式,来应对要素的高迁移性,尤其是人力资源的高迁移性。当然,要素的高迁移性也会进一步提高企业在国家和地区间的迁移性。通俗地说就是：一国及各地区如何确定自己在全球化产业链中的位置,哪些产业或产业环节可以配置于其他国家或其他地区？哪些产业或产业环节应该扎根于本国或本地区？所以,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怎样实现产业根植,即如何发展具有本国根基或地区根基的产业？应对这一问题,需要有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全球化新思维。这一问题在中国当前的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产业转型升级中，正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第一，技术创新可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拓展工业化空间。那么，技术创新的方向是什么？不仅仅是用新产业替代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而且，更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是，实现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用高技术支撑和改进传统产业。欧洲在规划其制造业发展方向时（欧洲制造业 2030），所提出的第一个"超越目前在资源效率和再工业化方面的现有边界的方式"就是"重视所谓的低技术制造业"，而且要让制造业重新回归城市环境，用高技术把传统优势产业升级为情感工厂（Factories of Emotions）。也就是说，产业转型升级不是"狗熊掰棒子"，丢一批旧的，抓一批新的；而是不离不弃地让产业与环境更和谐。产业更精益，更清洁，更环保，"与这种工厂为邻，客户、供应商和工人都会怀有正面的情感（Positive Emotions）"，就能使得这些产业长期根植于本国本地①。

第二，产业升级不仅是技术升级，更重要的是劳动适应，更有效地实现就业结构变革与人力资源国际配置。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劳动力资源的变迁性大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特别是高素质劳动者遵循"良禽择木而栖"的就业方式，企业必须学会雇佣和管理具有较强变迁性的人力资源；同时，劳动者的技能转换同产业技术的变化并非相同周期，在工业技术变革较快的时期，产业技术升级的周期往往显著快于劳动者的技能升级或转换的周期，相对于产业技术变迁，这类劳动者具有强的职业粘性，即从原有职业技能转为新的职业技能的"惰性"。这也是一些发达国家产生"逆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一些劳动者的职业技能难以适应产业技术升级而利益受损。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各类人力资源的作用，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和具有高度政策技巧性的课题。

第三，在全球化新时代，企业家也必须有新思维，从一定意义上说，产业转型升级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是企业家的升级，即素质提升。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产业转型升级主要是在众多企业家的带领下实现的。企业家以什么理念办企业，以什么方式获取利润，决定了产业发展的方向。企业家的实践眼界更决定了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景，如果更多的企业家都注重于获取短期利润，一心想"赚快钱"，那么，产业就难有真正的核心技术积累。产业核心技术的形成无不是企业家创新"耐心"的产物，没有执着的"耐心"，就难以形成真正具有中国根基的产业。

第四，产业转型升级的企业或企业家"耐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与政策环境。市场经济是具有高度工具理性的制度机制，工具的目标化，即以高效率的方式追求工具性目标"收入"、"利润"、"财富"等是其直接的动力机制。如果缺乏对市场机制的有效治理，任由工具理性主义极度放任，就会导致发展轨迹偏离人类发展的价值目标，例如，产业结构过度地"脱实向虚"。因此，市场经济是需要有效治理的经济，只有精心构建治理体系，才能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正确方向。当然，构建有效治理体系，并不是抑制市场发挥作用，相反，是要更有效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更不是要政府代替市场，相反，是要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治理得更完善的市场机制来决定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技术路线。特别是，在全球化新时代，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需要有新规则、新秩序，与之相适应。我们看到，在有些高技术产业领域，例如，信息技术（信息安全）、智能制造（机器人）、生物工程（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等领域，已经出现了许多必须进行新的法律规范以保证其健康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在大量使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领域，市场竞争出现了许多从未有过的现象，需要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① [德]恩格尔贝特·韦斯特坎博尔. 欧洲工业的未来：欧洲制造 2030[M]. 王志欣、姚建民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四、产业转型升级必须走更具包容性的道路

从一定意义上说,“逆全球化”现象是对全球化过程缺乏包容性的反动。由于全球化过程中的汲取性现象损害了其包容性,就会导致产生“反全球化”现象,甚至社会运动。在工业革命后的第一次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实行掠夺性的政策;在第二次全球化时代,霸权国家不仅控制势力范围,而且输出制度和价值观,导致全球治理失序,许多国家和人民没有受到关切,甚至利益受损。未能有效治理的全球化市场机制,没有很好实现世界各国共享利益,产生了国际和国内的两极分化和资源环境恶化现象,“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和社会运动此起彼伏。

因此,在全球化新时代,产业发展必须向着更具包容性的方向转型升级。而实现包容性的最重要方式就是优化市场经济的治理体系。例如,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市场调节过程中,往往面对着供给变化的不可逆性,或供给扩张弹性和收缩弹性的不对称性。如农用地变为工业用地和工业用地变为农业用地,农村建设为城市和城市逆变为农村,投资建成一座大型工厂和关闭工厂返回原样等,都是不可逆的,至少其扩张过程(顺过程)和收缩过程(逆过程)的顺畅性是非常不同的,而并不像市场经济理论所假定或默认的那样, 产业扩张和收缩可以像钟摆围绕一个均衡位置左右摆动那样顺畅和完全可逆。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也必须有规划(特别是空间规划),有政府导向和必要监管,甚至在有的项目决策上需要政府许可。否则,在市场调节过程中可能产生很大的成本和损失,导致许多人的利益受损害。所谓包容性,其实就是利益的兼顾性,而对市场机制的有效治理就是要使市场调节过程最大限度地协调各方利益,减少有关方的重大利益损失。

这在全球化的产业发展过程中尤为重要。因为全球化的产业发展涉及不同国家、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重大产业工程项目,可逆性低,涉及的社会利益群体广泛而复杂,所以更需要有效的治理结构。而如前所述,治理体系的不完善,甚至治理失序,正是全球化新时代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所以,产业转型升级要有全球化的治理新思维。国际产业竞争战略要立足于构建利益共同体,形成产业发展的供需协调机制。例如,中国巨大的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通过“走出去”而实现资源的国际有效配置,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方向,但是否能真正成为可行的方式,取决于是否能在有效治理体系下达到各方利益包容。

中国作为一个取得了巨大的产业发展成就的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实际上也是一个推进各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国际性方案。中国面临产业转型升级任务,“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国家也都面临各自的产业发展任务。如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促进各国具有包容性的产业发展,形成产业发展的利益共同体,互联互通,互利互惠,共建共享,是一盘全球化的大棋局。这盘大棋局,体现了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本性:只有惠及他人、他国,才能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和获益机会,因为没有需求的扩大就没有供给的增长。而具有良好治理体系的经济全球化,以及在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可持续产业发展,就是实现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总之,要客观认识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逆全球化”现象。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大趋势,尽管会遇到困难、曲折和阻力,但世界主要国家间并不会形成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严重对峙局面。世界产业竞争格局所决定的各国产业转型升级,只有在全球化大势中才能推进,“逆全球化”不是可行的出路,世界各国终究都会认识到这一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当然,由于各国产业发展受到国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并非只要融入全球化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走上产业转型升级的“一马平川”。从这一意义上说,各国应对全球化的政策主要不是国际政策,而是国内政策;主要不是国际市场规则安排,而首先是国内市场规则安排。只有当产品、要素、资金、信息等在国内能够自由流动、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公平竞争，才可能设想在国际以至全球范围能够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也就是说，只有国内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和市场竞争规则充分体现全方位开放和高度便利化的市场经济原则，才可能真正同经济全球化相融合，产业发展才能真正在全球化大格局中实现不断优化和创新升级，保持其持续性竞争优势。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产业在全球化新时代如何实现合意的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涉及各领域深化改革的问题，任重道远，难度不小，只有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充分理顺，更为自由和有序，才可能真正有效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也才有可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国家和领航旗手。

〔责任编辑：覃毅〕

"逆全球化"危机下的中美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

余淼杰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经过 GATT/WTO 多轮回合的谈判，贸易全球化已成为一个潮流和趋势。中国在贸易自由化和促进贸易便利化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①。自特朗普 2017 年 1 月就职美国总统之后，他在经济外贸投资方面的举措都是逆全球化而动。

一、特朗普新政下的中美贸易

特朗普当局上台的第一个举措是废除跨太平洋贸易协定（PPT），之后，宣布要筑建墨西哥边境墙。当然，美国为此必须开支约 216 亿美元，而且有可能必须从墨西哥或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水泥；此外，还必须从墨西哥雇佣更多的蓝领工人。所以，哪怕美墨边境墙建起来，对美国也不见得会是利大于弊。第三件工作是对加拿大的原木产品征收 20%的高关税，并威胁要废除北美自贸区协议。接着，特朗普又多次强调要限制外国的移民入镜，以图创造更多的美国就业岗位。不过，因为目前美国经济基本面已较好，基本接近充分就业水平，再多的贸易保护或限制移民也不见得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

不过，尚不确定的一点是，特朗普政府是否会真的按照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所承诺的那样，把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定位为"汇率操纵国"，然后强迫人民币升值 45%左右；或者，美国是否会对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征收类似的特保关税。这在特朗普上台之初，应该说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自 2017 年 4 月初习近平主席访美会见特朗普之后，双方政府同意通过贸易谈判和深入对话来讨论解决双边贸易分歧，并在 5 月中下旬形成十条主要的贸易投资初步谈判成果，内容涉及农产品贸易、银行等服务业和投资的具体措施。所以，目前看，也许两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不太可能发生贸易战。

但是，不太可能发生贸易战不等于说不会有贸易摩擦。不可否认的是，自特朗普上台以来，"逆全球化"危机已经浮现。那么，这种危机是否还会加剧，关键的一点就看中美双方是否会发生大规模的贸易摩擦。所以，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如果中美之间有了大规模的贸易摩擦或者万一发生"贸易战"之后，会对中美两国经济甚至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作者简介] 余淼杰（1976—），男，广东潮州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① 余淼杰，崔晓敏. 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贸易和投资促进措施研究[J]. 国际经济评论，2017，(3)：28–44.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为回答这个问题,郭美新等(2017)通过几种政策模拟,分析了潜在的贸易战对中美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额、生产和福利的影响①。他们首先分析了当前中美双边贸易结构与贸易争端。自特朗普就任以来,中美贸易争端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加入 WTO 造成了美国 GDP 增速下滑、国内失业率上升和制造业岗位流失;二是美国指责中国对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包括国家的扶持战略和政府采购过程中的偏向性,认为这对于外国公司是一种不平等待遇;三是美国指责中国对美国出口企业施加贸易壁垒,比如配额和许可,从而以牺牲国外企业的方式对中国下游制造业企业给与优惠;四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争端。然而,事实上,这些贸易争端又是与中美目前的双边贸易结构紧密相关的。

目前,中国和美国已经成为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美双边贸易额从 2001 年底的 980 亿美元快速增长到 2016 年的 5240 亿美元,年均增速 14%。在中美双边贸易中,机械和电子产品是中国对美出口的最主要产品,2016 年约出口 1730 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 44%;纺织品是第二大出口产品,2016 年约出口 420 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 11%。贸易争端主要发生在钢铁行业。美国政府批评中国政府支持国内钢铁和铝制品行业,向全球倾销 1 亿吨钢铁,扭曲了全球市场结构。其中,2011—2015 年,美国对中国企业进行了 29 起反倾销调查和 25 起反补贴调查,包括针对钢铁行业的 11 起反倾销和 10 起反补贴调查。目前,欧美国家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因而会对其主要的出口目的地——欧美市场进行倾销。那么,到底在学理上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呢?或者更明确地讲,中国主要的工业部门到底存在多么严重的过剩产能呢?

余淼杰等(2017)强调产能利用率的衡量是理解和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②。他们利用资本折旧率作为代理变量,在生产函数分析框架中构建了一种同时衡量产能利用率和生产率的方法。该方法清晰界定了产能利用率的概念,具有广泛的可扩展性。他们利用该方法估计了中国工业企业 1998—2007 年的产能利用率,发现在此期间中国工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经历了一个整体上升的过程,但是不同性质的企业具有高度的异质性。生产率较高、人均资本存量较低、出口产出比更高以及利润率更高的企业更有可能伴随着更高的产能利用率。

为了更好地刻画中美两国间的贸易,必须把中美双边贸易放到一个全球贸易的框架中。中美两国虽然是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各自的市场也向其他国家开放。同时,如果一国对另一国实行高关税,那么不只会影响被征收高关税的国家该产业的生产和贸易,也会影响该国其他上下游产业的生产和贸易。郭美新等(2017)考虑了一个多国家—多部门并允许上下游部门互动的李嘉图模型对中美潜在贸易战对中美经济的影响做了几种模拟分析。

第一种情形,如果发生贸易战,美国单边对中国所有产品征收 45%的高关税。这个假设有两方面考虑:如果美国把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就可以要求人民币升值 40%—45%,相当于对所有产品征收 40%—45%的关税;如果美国不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将对大部分制造品征收 35%的产品关税,现在美国对中国的产品平均关税是 3%—4%,所以加起来在 40%左右。这种情形下,美国的进口减少而产出增加,特别是石油、纺织品、木制品和电脑的进口量下降最为显著,约为 1/4;中国总产出在 11 个部门会有所下降。尽管如此,关税对总产出的影响并不大,大约减少不到 5%,因为中

① 郭美新,陆琳,盛柳刚,余淼杰. 特朗普贸易战对中美经济的影响[R].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2017.

② 余淼杰,金洋,张睿. 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衡量与企业生产率估算[R].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2017.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国可以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出口。给定美国对中国实施单边贸易关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几乎被摧毁，平均下降 75%。由于高额关税导致更高的国内物价，美国的真实收入会下降0.6%；中国真实收入会下降 0.38%，程度远小于美国。一些小国如卢森堡、新加坡，由于美国限制了中国的出口，中国的主要出口品会更多出口到其他国家。这样，那些小的开放经济体就会从美国的单边贸易战中获利。

第二种情形，美国对中国的所有产品征收 45%的高关税，中国也以牙还牙，对美国所有产品征收 45%的高关税。这种情形下，双边进口量都会大幅度下滑。美国总产出、总进口、从中国进口都与第一种情况相似。在电脑、纺织品、电子产品这三个行业，美国的总产量会扩张。中国总产出和总出口的变化程度也与第一种情况类似，但纺织业和电脑业总产出和总出口显著降低。所以，从生产的角度，中国受损比较厉害。从真实工资的变化看，美国下降 0.75%，中国福利反而上升 0.08%。小国仍将从贸易战中"渔翁得利"。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之所以在贸易战中会实现福利上升，主要是因为模型假设中国在发生贸易战之后会增加从其他国家（美国除外）的进口。经济学的直觉是，虽然因无法出口美国导致中国企业生产受到负面影响，工人工资会下降，但如果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话，因为更多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生产厂商不得不对产品降价，国内消费者能够以更低价购买到产品。如果价格的下降比工资下降更大的话，就可以实现真实收入的提高、福利的改善。

当然，如果中国在发生了贸易战之后没有从其他国家（美国除外）增加进口，中国和美国都会有福利损失，而且中国的损失更大。原因在于，中国工人工资下降但消费品的价格并没有下降，这样就会造成福利损失。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发生贸易战之后中国是否增加进口。

总之，郭美新等（2017）的研究中的各类模型校准显示，美国在各类潜在的贸易战中基本都是受损最大的。而中国可能在贸易战中受损，也可能受到的影响不大，关键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实现贸易再平衡。而保持贸易平衡的关键是促进同其他国家的贸易，从其他国家多进口。

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主张

在刚刚结束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如何推进贸易全球化、促进贸易便利化作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具体的合作倡议。

（1）促进贸易增长。中国准备在未来五年内增加进口 2 万亿美元，换言之，要在五年内实现进口翻一番。这个力度可以说是非常可观的。目前中国的进口总额是 2 万亿美元，已经占全球进口的一成以上。如果换成 GDP，就是中国要在五年内进口一个印度。

中国五年内大幅度增加进口，对已有贸易伙伴都是互惠双赢。中方增加进口，对"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伙伴而言，自然就是扩大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出口，有利于扩大其贸易顺差，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中方而言，增加进口虽然会减少贸易顺差，但目前已有 3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每年过多的外贸顺差其实给国内造成了一定的通胀压力。所以，适当地减少贸易顺差其实有利于中国宏观经济。从微观层面看，更多的进口带来了更多可供中国消费者选择的消费种类。市面上各产品的竞争也激烈了，自然出售价格也被"杀低"了，老百姓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何乐而不为？

当然，进口增加对一部分企业、行业会造成冲击，短期内企业可能会感受到竞争压力；但从长期看，企业可以化压力为动力，努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品质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从"一带一路"贸易伙伴特别是东盟国家进口产品多数为原材料、中间品，这样，中国进口关税的下降、贸易便利化的推进其实相当于为中国企业节约了进口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了企业的利润。所以，企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业其实也是贸易全球化的获利者。

事实上,最近笔者利用制造业企业和海关的大数据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对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非常明显①。其中,原材料中间品的进口关税减免对企业有明显的成本节约作用,因而企业能够留存更大利润,从而有效地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换句话说,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2)振兴相互投资。未来五年,中方对"一带一路"相关经济体直接投资预计达 1500 亿美元。这个数是什么概念?去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约为 1450 亿美元,占全球直接投资的 9.9%。也就是说,五年之内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要在目前的基础上翻一番。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的提升有明显的正面作用。就投资类别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多为绿地投资,具体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设施类投资,比如中铁建和中信联合在北非修建的长达 1216 公里的高速公路,西起摩洛哥,横跨阿尔及利亚,东达突尼斯。这类投资极大地改善了东道国的基础设施。"要想富,先修路"。好的基础设施对降低东道国的交通运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不需赘言。对此,Liu et al.(2017)专门研究了 21 世纪以来中国基础设施改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内销和出口的影响②。通过构建企业距离国道省道高速公路的距离作为衡量企业所面临基础设施的变量,他们发现中国基础设施的改善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内销和出口额。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第二类对外直接投资:成本节约型的企业对外投资。过去 15 年,中国的工资大幅上涨,劳工成本明显增加。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于亚非拉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没有任何比较优势。比如,目前广东普通蓝领工人的月工资大约 3000 元,而北非的埃塞俄比亚的工人工资折算成人民币只有 252 元,不到东部沿海省份的一成,而他们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却是中国工人的一倍左右。相比之下,埃塞俄比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正是洞察到这个商业"秘密",生产鞋帽的东莞华坚公司才在亚的斯亚贝巴雇佣了 3000 名当地工人。像华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为节约成本"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投资,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渐渐成为一种潮流。目前为止,已有近 2000 家中国民营企业到非洲去投资,并雇佣了大量当地工人,帮当地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当然,"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中方企业的海外利润也相当可观。

有意思的是,在目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投资中,将近 50%的中国对外投资主要是以贸易办事处和进出口公司为代表的贸易服务型投资。以往的研究只关注汇率变化对制造业投资的"出口替代"影响,而忽略了出口与贸易服务型投资的"互补关系"。同时,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在这两类投资中应该有所不同。对此,田巍和余淼杰(2017)研究了汇率变动对异质性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尤其是汇率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出口传导"效应,发现汇率上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尤其贸易服务型对外投资③。

同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也都能够有力地促进企业研发。余淼杰等(2017)同时考虑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二者对企

① Yu, Miaojie. Processing Trade, Tariff Reductions, and Firm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J]. Economic Journal, 2015,12(5):943-988.

② Liu, Dan, Liugang Sheng, and Miaojie Yu. Highway Access and Firm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mimeo, Peking University, 2017.

③ 田巍,余淼杰. 人民币汇率、贸易服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J].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2017.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业研发影响的交互性。他们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同时，这种影响与中间品进口自由化程度密切相关；对于中间品进口自由化程度较低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研发的促进作用更大①。

(3)促进包容可持续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绿地投资自然是好事，但如果当地工人没有生产、管理经验，小到无法有效使用复杂的机器设备，中到企业管理模式落后，大到国家官员缺乏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布局，则可能就会"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无的放矢"。为此，中方提出了第三个重要倡议，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包容可持续发展。具体地，中方将为沿线经济体提供1万个来华研修和培训名额，培训他们使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管理经验，真正做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事实上，早在2015年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倡议设立南南合作和发展学院，促进南南国家深度合作。2016年，这个设想成功落地。在商务部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专门成立南南合作和发展学院，并已完成一期招生，来自"一带一路"沿线27个国家的48名学员在该院攻读国家发展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中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部长，也有来自中亚各国的年轻学员，他们都很迫切地想通过学习中国发展经济的经验，努力把本国经济搞上去。

"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历史机遇，人民币国际化则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流动性支持。张帆等(2017)回顾了"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渠道和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估算了"一带一路"建设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中期影响；同时，使用引力模型估算了货币互换协议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发现货币互换协议对双边贸易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中国与相关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显著提高了中国与该国之间的贸易值，并且互换规模越大，相应提升贸易值的作用也越大②。

综上，我们认为，贸易全球化可以促进中国与其他贸易国的福利。这里对于福利的提升主要是从进口的积极作用这一渠道来论证的。主要是因为进口能够有效地降低国内消费品价格，但同时，中国企业也应该从提高"内功"角度出发，大力提升企业自身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技术进步，促进企业效益的增长。

三、中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教授曾经讲过，生产率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为此，他发现东南亚国家早期经济的发展只有资本的积累、劳动投入的增加，但就是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他预测这些东南亚国家迟早会发生经济危机。果不其然，三年之后，1997年东南亚国家就发生了经济危机。

那么，近年来中国经济到底有没有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研究发现。例如，之前有研究利用中国宏观行业数据，发现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并没有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所以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也很悲观。事实上，这是因为宏观数据存在加总偏差的问题。最近，有一些学者包括笔者在内利用中国的微观企业数据，也就是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2000—2008年间中国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其实增长很快。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为什么有不同的结论？主要原因除了宏观数据加总可能产生误差以外，

① 余淼杰，智琨，田巍. 对外直接投资、贸易自由化与企业研发：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R].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17.

② 张帆，余淼杰，俞建拖. "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J]. 人民论坛，2017，(5)：28-45.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还有就是计量方法的不同。如果以附加值来衡量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中国该段时间内有 2.7%的年增长率;如果以毛产出来衡量,则年增长率可以达到 7%。这个发现比较可靠。因为如果中国微观制造业企业没有每年 7%的年增长率的话,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宏观的 GDP 增长率能达到 8%以上①。

那么,如何才能够实现比较可持续的 TFP 的增长? 可能的途径至少有三点:一是提高教育和培训投入;二是多进行研发;三是通过贸易全球化。

第一,人力资源的提升是实现 TFP 提升很重要的途径。教育年限的增加可以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不过这里想强调的是,教育不仅包括正式教育,也包括非正式教育。作为非正式教育的重要形式,在岗培训也是提升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Liu et al.(2017)研究了企业内部培训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提升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发现如果进口竞争更为激烈的话, 企业的平均利润会下降,企业就不愿投入太多的资金进行企业内部培训;低生产率的企业更可能培训工人,否则如果生产率没有上升,这些企业就会被淘汰出局;最终品关税减免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会对那些有较大的工人培训投入的企业作用更大②。

第二,企业研发也是 TFP 提升的途径。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鼓励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方向自然是正确的。但必须强调的是,还需要区分两类不同的研发,一种是工艺研发和生产过程改进,一种是新产品的研发。工艺研发和生产过程改进更适用的行业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说服装行业等),新产品的研发则可能对技术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更有效。

这里面就涉及另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固然更多的研发是从产品本身的工艺创新开始,不过,中国的技术发展有没有可能经历一个弯道超车的过程呢,也就是克鲁格曼教授所提到的"蛙跳理论"。发达国家因为在传统的技术上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如果这些技术比较成熟,就不太愿意去尝试新的技术,而发展中国家刚进入某个行业,不论对当前成熟技术还是对新技术,其投入都差不多,这样的话,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对新产品进行研发。比如,华为现在是中国最大也可能是最成功的私有电信企业,每年的研发投入是 110 亿美元。它的成功应该是跟其巨额研发投入有很大关系。

第三,贸易自由化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具体而言,贸易自由化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国外关税的减免、中国最终品关税的减免和中国中间品关税的减免。三种方式都可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先来看国外关税的减免对 TFP 的提升作用。中国作为 WTO 的一个成员国,中国降低进口品关税的同时,国外的贸易伙伴国也会降低对中国出口品征收的进口关税。这就可以提升中国企业海外销售的市场份额,市场的扩大可以给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从而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再来看中国最终品关税的减免,也可以通过进口竞争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比如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奇瑞,当中国对进口丰田汽车降低关税的时候,就会给奇瑞带来与其他汽车厂商之间更激烈的竞争。这样,生产率比较低的企业就会被淘汰出局,而生产率比较高的企业则可以做大做强。还有就是中国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比如,如果中国降低了进口轮胎的汽车关税,那么相当于降低了本国汽车制造商奇瑞的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利润,从而促进其生产率提升。

那么,问题是在所有的不同贸易自由化形式中,到底哪个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最大

① 余淼杰. 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理论与实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② Liu, Qing, Larry Qiu, and Miaojie Yu. Worker Training, Firm Productivity,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J]. The Developing Economics, 2017,55(3),Forthcoming.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呢？Yu(2015)利用中国的微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最终品关税的下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比较大，但如果考虑中国的贸易有 1/2 以上是加工贸易（目前约有 1 万亿美元）且加工贸易免交关税这两个重要性质，所得的发现就会有不同。特别地，如果去掉加工贸易，中间关税减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就变得更大。这个发现跟使用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所做的其他研究的结果是一样的。①

总之，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微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很大的进步，贸易自由化是促进企业生产率进步的重要因素。各种贸易自由化可以解释中国 15%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同时，中国经济目前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特别是中国的老龄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目前中国老年人口数在不断增长。中国有 13.7 亿人，而人口抚养比是 37%。所谓人口抚养比，就是年龄大于 65 岁的人口和小于 15 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37%的人口抚养比仅就世界横比层面来讲是很低的，但从时间维度作纵向比较的话，则在不断上升。目前，中国超过 60 岁以上的人口有 2.22 亿人，占所有人口的 16%，也就是说，老龄化将是中国要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断增加的人口老龄化表明中国不再是一个劳动力廉价的国家。中国的劳动力不是可以无限供给的，2004 年以前人口红利最大的时期已经过去。之所以人口红利在下降，主要由两个原因导致：一是劳动力本身的供应在下降，二是中国在各个地区实施了最低工资法。

目前中国已经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国家。前面的论述也已举出中国与非洲等其他低工资国家的劳动成本的差距。学术界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各地区最低工资的实施能否提升出口品的国内附加值。余淼杰等(2017)研究了最低工资上涨对中国出口企业国内附加值比的影响②。他们发现，当要素替代弹性较大时，最低工资上涨促使企业生产成本上涨，用资本、中间品等替代非技术工人，并最终导致其利润率、成本加成和国内附加值比重降低。然而，当非技术工人的可替代性较小时，最低工资上涨则可能使得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重被动提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涨使得一般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下降，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的上升有助于冲销最低工资所带来的负向影响；最低工资上涨则对不同生产率和劳动密集度的加工贸易企业存在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劳动比较低时，最低工资上涨可能迫使其国内附加值比重被动提升。

那么，回到真实世界中，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有多少工作可以外包转移。中国目前的总就业数是 7.8 亿人，其中，制造业就业占了 35%。这样一算，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是 2.5 亿人，而在制造业部门最少会有 8000 万工人。这其中哪怕一小部分转到外国去，也会对当地的就业产生积极、明显的影响。那么，哪里才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目的国呢？通常的看法是东南亚国家距离中国比较近，应该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理想目的国，但其实不然。这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上升，所以现在把生产基地从中国转到东南亚国家的企业，一两年后就会发现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又不复存在，届时中国企业还要再次搬家，所以东南亚国家并不是理想的选择。相反，那些投资环境比较理想、社会治安又比较好的非洲国家倒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选择。再者，如果劳动密集型产业搬出去了，中国国内的劳动力又该如何找工作呢？笔者认为，他们应从劳动密集型行业更多转到以服务业为重心的行业。目前中国的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只有 50%左右，比许多经合组

① Yu, Miaojie. Processing Trade, Tariff Reductions, and Firm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J]. Economic Journal, 2015,125(5):943-988.

② 余淼杰，崔晓敏，袁东. 最低工资和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来自中国企业层面证据[R].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17.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织国家 75%—80%的水平要低得多,所以中国现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大众创业”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 OFO 单车项目。

最后,中国应该尽快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尽管产品的质量与国内附加值并不是同一概念,但总体而言是正相关的。余淼杰和张睿(2017)重新衡量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品质量①。他们的研究强调,当要衡量企业产品的质量时,传统上使用产品的单价作为代理变量的做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不同的产品如果有同一单价,占有市场份额较大的产品质量应该更好。不过,仅单价和市场份额这两个需求面的因素也不能决定产品质量的高低,同时还得考虑供给面的因素,即高生产率的企业通常可以把产品的价格定得较低以此保证竞争力,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产品质量就差。总之,只有提升了产品质量,企业的生产率才可能提高,中国经济才得以持续增长。

四、结语

总的来说,特朗普上台后实行了贸易保护政策,“逆全球化”趋势明显。“习特会”之后中美两国贸易呈现出良好势头,中美未来的发展态势应该会有良好的发展。但中国也应该“未雨绸缪”,如果特朗普坚持打中美“贸易战”,中国应努力避免其负面影响,大力实现贸易全球化,推进自由贸易,积极扩大进口,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争取一个“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同时,努力提升企业生产率,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责任编辑:覃毅〕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立场及中美贸易发展前景展望

王孝松

从特朗普宣称的施政纲领看,其就任总统后将可能强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促使本土投资和制造业回归,誓要夺回美国“制造业大国”的桂冠。特朗普竞选期间的言论表现出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包括退出 TPP、撕毁 NAFTA,甚至退出 WTO,呈现在世界面前一个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形象。然而,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提出的政纲不一定完全实施,特朗普上任后是否兑现这些主张,最终取决于他所代表阶层的利益。

一、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立场

1. 优先强调美国利益

特朗普竞选期间一直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具体而言,什么是“美国利益”?实际上,美国人民内部根据收入水平划分为不同阶层,也存在利益分歧,所以“美国利益”并无统一定义,也没有具体检验标准。特朗普是一个成功的大商人,属于上层资产阶级,其所属的共和党一直都是上层阶级利益的维护者。然而,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一直强调制造业回归,重视维护美国中下层劳工阶级的利益。分析不断分化的“美国利益”、特朗普所持的阶级立场,以及特朗普所具有的党派性,是判断特朗普内阁贸易政策立场的基石。

对外开放使得美国上层阶级获利远超中下层阶级。在美国,自由贸易使得美国制造业被掏空,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工人福利受损,而掌握大量资本的上层精英是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基于特

[作者简介] 王孝松(1983—),男,天津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① 余淼杰,张睿. 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准确衡量:挑战与解决方法[J]. 经济学(季刊), 2017,(1):463–484.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朗普的职业背景和所属党派，我们认为其代表的是美国上层阶级的利益，因此，他的对外贸易立场总体上会偏向开放。特朗普提名的经济领域重要内阁成员大多为大商人，可以断定，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特朗普内阁在任期内不会实施极端的保护主义措施。

2. 反对多边，重视双边

2016 年 11 月 21 日，特朗普在竞选成功后公开表示，在上任之后便会立即推动美国退出 TPP 协议，与此同时，他将主推能够给美国提供更多工作岗位的双边 FTA 协议的谈判。特朗普在贸易协定方面展现出的立场是"反对多边，重视双边"。

从特朗普竞选期间的言论看，他认为多边贸易协定损害了美国利益，主要是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的大量流失。具体而言，多边贸易协定让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墨西哥）廉价的制造业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让美国的制造业企业逃离本土去往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从而造成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使美国制造业的岗位流失。

另一方面，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普遍掀起了"逆全球化"的浪潮，以 WTO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框架遭受重创，而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则备受欢迎，其原因是，相比于多边贸易协定，双边协定能更容易满足两国的利益诉求，谈判难度相对较小，而且各国往往选取主要贸易伙伴进行谈判，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根据特朗普的竞选口号"美国利益优先"，凡是通过双边贸易能够使美国获益的国家，特朗普就会与该国进行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目前，特朗普所认为的能够让美国获益的双边贸易协定，就是能够让美国企业（主要是制造业）回归美国的协定，这些协定能充分扩大美国就业。

3. 撕毁已有协议

特朗普就任之后，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 TPP。而在此前的竞选演说中，特朗普还曾指出要同墨西哥、加拿大针对 NAFTA 重新谈判，甚至可能终止 NAFTA。特朗普在 2016 年 7 月还曾经谈到，如果 WTO 阻止其向将生产活动转移出美国的企业征税，美国将可能退出 WTO。

TPP 是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极力倡导的，12 国达成 TPP 协议也成为奥巴马执政时期在贸易领域的重要成果。在美国，众多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常抨击在位总统的施政方针，特别是对所属不同党派在位者进行猛烈的抨击。特朗普也不例外，他抓住了中小资产阶级和劳工期待增加就业岗位的心理，抨击在位总统这一"使美国制造业空心化、转出工作岗位"的举措，从而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选票。但商人崇尚利益的本质意味着特朗普十分务实，每行动一步都会权衡成本和收益，都会积极协调各方利益。最终，在国会共和党高层和美国商界的支持下，特朗普在上任之初便宣布美国退出 TPP。

而对于撕毁 NAFTA 协议和退出 WTO，则更是特朗普竞选期间争取劳工等阶层选票的手段。特朗普深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已经发展到相互依存、无法分离的状态，终止 NAFTA、惩罚墨西哥也仅仅是为了平息部分民众因失去工作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作为关贸总协定（GATT）的发起者和 WTO 的主要创立者，美国要展现出崇尚自由贸易的姿态，务实的特朗普不会使美国成为第一个退出 WTO 的成员，其相关言论也是旨在给 WTO 和自身的主要贸易伙伴施压。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总体对外贸易立场依然是开放的，不会如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所宣称的那样，转向极端的保守主义。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特朗普贸易政策立场的成因与前景

1. 世界贸易发展停滞和“逆全球化”思潮盛行

2012—2015 年,全球贸易增速已连续 4 年下滑。2013 年以来,增速已连续 3 年低于 3%。这种情况在 2015 年达到顶峰:世界贸易总额的降幅高达 13.6%,其严重程度仅次于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的 2009 年。而在 1980—2012 年之间,全球贸易年均增速约为 7.2%,是全球 GDP 增长速度的两倍。

从 2014 年开始,“逆全球化” 的浪潮已经愈发高涨, 其重要标志便是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下降。因为贸易全球化的先导主要是资本从发达国家持续流入发展中国家,这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全球贸易的飞跃。但从 2014 年起,发达国家的资本不断回流,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不断下降,持续至今。而英国脱欧、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更表明“逆全球化”浪潮已席卷发达国家。

2. 美国逐渐丧失在世界经济中的核心地位

长期以来,美国是全球化最重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主要的动因是获取利益。“二战”之后,由于美国具有超强的经济实力,因此,旨在通过推动资本的跨国流动而增强对全球经济的控制。特别地,美国一直常年保持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直到 2012 年,美国贸易总额仍居世界第一位。2013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之后,世界贸易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贸易地位的下降使美国参与全球化的热情消退, 美国各界认为参与全球化带给美国的利益不断减少,甚至可能带来福利的净损失,这种反思导致国内众多群体极力反对全球化,希望美国对外贸易政策趋于保守。

3. 美国国内失业和选票竞争

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统计数据,美国失业率在 2009 年 11 月达到 9.9%的峰值,此后,随着经济的缓慢复苏,失业率持续小幅下降;进入 2013 年,失业率已低于 8%;2016 年 1 月,失业率进一步降至 5%以下;2016 年全年,只有个别月份的失业率为 5%,绝大多数月份的失业率都低于 5%。

然而,从现实看,众多的美国劳动者则忧心忡忡,认为自己的工作并不理想,并且随时可能丢失工作。特朗普抓住了广大民众渴求良好就业机会的心理,围绕“重振就业、创造岗位”作出一系列承诺和表态,其中也不乏民粹主义思想,包括增强本土制造业竞争力、促进制造业回归、对中国等贸易伙伴施加保护措施等。

在选举过程中, 特朗普承诺将采取包括贸易保护措施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为民众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特朗普极为重视就业的姿态使其颇受中小资产阶级和劳工群体的青睐, 因而在竞选中,特朗普在绝大多数州都获得了多数选票,为其入主白宫增添了重要的筹码。

4. 受制于美国的政治制度

特朗普在竞选中的众多言论极具攻击性,使人们认为他必将采取极端的贸易保护政策。然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特朗普个人无法做出全部决定。从美国的政治体制看,首先,美国的宪法规定,参议院在条约批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贸易相关的众多议案属于国际协定范畴,按照条约生效的要求,仅当 2/3 的参议员赞成之后,总统才能批准条约。这就是说,撤销美中世贸谈判协议(以及退出 WTO 和 NAFTA 等),特朗普个人无法决定。其次,根据美国法律,美国总统最多在紧急状态之下,可以对外国的部分产品实施最高 15%的关税,而且实施的时间只能是 150 天以内。而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说要对中国的商品征收 45%的关税,这无疑是无法实现的。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中美之间多年来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沟通和对话机制, 从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一直到中美双方委员会,都有十分畅通的对话机制。无论谁就任美国总统,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无法避免的,但只要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两国之间有良好的沟通渠道,就能够确保贸易摩擦不会演变成贸易战。

此外,两党制在美国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两党在贸易政策方面的立场差异十分鲜明,共和党强烈支持自由贸易,民主党则基于环保、劳工、人权等方面的理由,强调“公平贸易”,其本质是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表 1 列出了 2001 年以来众议院对涉及贸易议题议案的投票结果,从投票分布看,两党在贸易政策领域的态度截然相反:民主党通常对贸易自由化议案加以否决,或者以加入严格的环境或劳工标准为附加条件,而共和党则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议案。

特别地,一些勉强通过的自由贸易议案更是凸显了鲜明的党派性。2001 年的快车道授权的议案以 215 比 214 获得“险胜”,其中,有 194 张赞成票来自共和党人(R),而仅有 21 名民主党人(D)对该议案投了赞成票。与此同时,有 189 位民主党人反对快车道授权议案,而共和党中只有 23 人反对该议案。

表 1 所列其他议案的投票结果也充分体现出两党在贸易政策领域的对立。可以清楚地看出,2010 年以来的贸易议案,几乎没有“险胜”的情形,这由两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构成决定。2010 年的“公平贸易法案的汇率改革”议案是一项贸易保护议案,当时在位的第 111 届国会中有 256 名民主党人和 178 名共和党人,其中,97%的民主党人对此议案投出了赞成票。因此,仅民主党的赞成票就超过了半数,确保了议案的通过。而从 2011 年第 112 届国会就任以来,共和党议席一直维持在 240 左右,民主党议席仅维持在 190 左右,由此,2011 年以后的各项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议案都以压倒性多数获得了支持。

表 1　　2001 年以来重要贸易议案的投票结果

年份	议案	赞成	赞成(D)	赞成(R)	反对	反对(D)	反对(R)
2001	快车道授权	215	21	194	214	189	23
2002	2002 年贸易法案	215	25	190	212	183	27
2003	建立美国—智利 FTA	270	75	195	156	128	27
2003	建立美国—新加坡 FTA	272	75	197	155	127	27
2005	建立(CAFTA)	217	15	202	215	187	27
2006	建立美国—阿曼 FTA	221	22	199	205	176	28
2007	贸易调整援助(TAA)计划	264	226	38	157	2	155
2008	推迟与哥伦比亚建立 FTA 的考虑	224	218	6	195	10	185
2010	公平贸易法案的汇率改革	348	249	99	79	5	74
2011	执行美国—韩国贸易协定	278	59	219	151	130	21
2011	执行美国—哥伦比亚贸易促进协定	262	31	231	167	158	9
2014	本国繁荣与全球自由法案	266	46	229	150	148	2
2015	2015 年贸易便利化与贸易促进法案	256	24	232	158	155	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相关记录整理。

可见,近年来美国国会在贸易议题上的党派性愈发凸显,共和党人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支持自由贸易的立场非常鲜明,相反,民主党人则极力反对自由贸易,两党在国会中的议席成为贸易议案最终投票结果的重要影响因素。2017 年和 2018 年在位的是第 115 届国会,众议员中有 243 名共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和党人和 198 名民主党人，而参议员中有 53 名共和党人和 47 名民主党人，这样的党派分布意味着，未来两年在贸易议题上，美国国会不会陷入贸易保护主义的泥潭。

三、特朗普贸易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1. 模拟方法

本部分旨在预测特朗普所实施的贸易政策对中国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本文采用了跨国跨行业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进行模拟。按照 CGE 模拟的一般假定，本文设定了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不同国家间的产品存在差异(即 Armington 假定)，资本可以在国家间流动，生产函数为 CES 形式，生产要素与中间投入不可替代。与此同时，私人消费需求由 CDE (Constant Difference of Elasticity)支出函数决定，并且政府支出对各国最终产品的需求份额是固定的。

在上述假定下，使用 GTAP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数据库第 9 版的数据①，首先确定各国社会收支矩阵和弹性参数，随后以 2015 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为基准，将模拟结果所得到各项指标的绝对值转化为相对变动比率。为全面模拟出特朗普内阁不同贸易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本文在测算时根据美国对中国征税状况，设定了 4 种情形(见表 2)。

表 2　　模拟情景的具体描述

情形	具体描述
情形一	对中国实施最惠国关税
情形二	对中国征收 15%关税
情形三	对中国征收 30%关税
情形四	对中国征收 45%关税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2. 特朗普贸易政策对中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影响

情形一代表了特朗普内阁最为开放的贸易政策，即对中国保持最惠国关税水平。此时，中国进出口会沿着当前良好的趋势平稳增长，贸易顺差将会增加约 10 亿美元。同时，伴随着贸易条件的小幅恶化，实际 GDP 约下降 0.01%，国民福利约减少 10 亿美元(见表 3)。综合来看，如果特朗普未对中国实施附加关税，则中国对外贸易不会受到较大影响，“特朗普冲击”仅对中国的贸易、产出和国民福利产生了微小的影响。

情形二模拟了特朗普力主对中国产品征收 15%的关税。此时，对中国出口和进口的负面影响几乎相等，会使中国的贸易顺差保持在现有的水平，而对国民福利的负面影响约为 51 亿美元。

情形三模拟了特朗普内阁对中国采取了较为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对中国产品征收 30%的惩罚性关税，更多地使用各种非关税壁垒等，各种贸易壁垒的从价等价关税为 30%。此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较大，减小幅度将达到 2.19%，而进口减小幅度为 0.37%，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减小约 40 亿美元，国民福利减小约 101 亿美元。

情形四代表了特朗普内阁实施最为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情形，即对中国产品征收 45%的惩罚性关税。此时，出口下降的幅度仍显著大于进口下降幅度，贸易顺差减小了 53 亿美元左右，贸

① GTAP 数据库提供了以 2011 年为基期，包含 140 个经济体、57 个部门(其中，42 个为商品部门)的双边贸易、宏观经济、关税分解，以及服务贸易、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等方面信息。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易条件略有恶化，而国民福利损失约 138 亿美元。同情形三相比，美国退出 TPP 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和进口下降幅度更小，贸易顺差和国民福利的减小幅度下降，表明美国退出 TPP 实际上会给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减小障碍，有利于中国进出口发展，并带来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地，这将会给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带来更多空间，使中国朝着主导亚太乃至全球贸易规则的方向前进。

综合来看，由于中国目前的贸易顺差已超过 5000 亿美元，GDP 规模约为 10 万亿美元，因此，模拟得到的贸易顺差和国民福利减小的幅度十分有限，按照最差的情形（即情形四），美国的贸易保护手段和区域贸易安排叠加，会给国民福利带来 1.4%左右的下降。

表 3　　特朗普贸易政策对中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影响

情形	出口（%）	进口（%）	贸易顺差（亿美元）	贸易条件（%）	实际产出（%）	国民福利（亿美元）
情形一	–0.05	–0.05	10.38	–0.05	–0.01	–10.42
情形二	–0.26	–0.49	0.13	–0.19	–0.04	–51.38
情形三	–2.19	–0.37	–40.83	0.02	–0.41	–101.50
情形四	–2.53	–0.88	–53.15	–0.13	–0.58	–137.65

注：国民福利为希克斯等价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3. 特朗普贸易政策对中国产业的影响

具体到产业层面，本文发现在美国同中国保持正常贸易关系的情形下，中国大部分行业的产出所受影响微乎其微，只有化工、纺织品、服装三个行业的产出变动幅度超过 0.5%，其中，纺织品行业的变动超过了 1%。出口受到抑制较大的行业有运输设备、钢铁和金属制品等，与此同时，这些行业的进口仅受到了较小的阻碍，这就使得这些行业的贸易顺差有所缩窄，在 2 亿—5 亿美元之间。

在情形二中，美国对中国制造业产品普遍征收 15%的关税，会造成中国各行业产出的全面下降，但下降幅度十分有限，除纺织品和服装两个行业的降幅大于 1%以外，其他行业的降幅均不足 1%。在出口领域，受到较大抑制的有运输设备、钢铁、金属制品等，这些行业的贸易顺差将会减少 3 亿—6 亿美元。

在情形三中，美国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税率高达 30%，此情形下，中国各行业受到的冲击明显增强，服装和纺织品行业的产出下降幅度高达 4.3%和 3.0%，而运输设备和钢铁行业的出口将分别下降 6.0%和 5.8%，而贸易顺差都会有超过 6 亿美元的下降。

在情形四中，尽管美国对中国征收了 45%的惩罚性关税，各行业受到的总体影响也十分有限，即使是纺织品、服装、化工等行业，产出和出口的下降幅度也十分有限，特别是贸易顺差指标，几乎未发生变动。这就揭示出中美双边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性，意味着美国在众多领域仍然是中国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未来发展十分关键。

综合来看，美国对中国征收较高关税会对中国相关产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对重点行业的产出和出口产生抑制作用。但美国加入 TPP 的作用比高关税的作用更大，在美国退出 TPP 的背景下，即使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征 45%的高关税，对各行业的产出和贸易影响也微乎其微①。

① 限于篇幅，我们略去了对产业影响的具体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四、中国的应对措施

第一,以对话沟通的方式协调好双边利益,努力兼顾双边利益,创造出双赢的局面。多年来,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沟通和对话机制,并通过对话使双边关系不断发展。当前,特朗普主导美国制造业回归,会使众多跨国公司的资本回流,意味着美国主动地、渐进地收缩战线,逐步降低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控制度,这为推动美国和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发展相对平等的对话提供了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加强中美两国的对话沟通,以此进行利益协调,将会有效地缓解两国之间经贸领域的冲突,并抑制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

第二,促使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发展,对关键行业和关键产品进行全方位支持。根据本文的模拟结果,在美国实施高关税的情形下,纺织品、服装、钢铁等传统行业,以及运输设备等新兴重要行业,产出和出口可能会受到严重的负面冲击,而这些行业吸纳了大量就业,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未来政策不确定的预期下,政府、行业、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防止重点行业的产出和出口过度下滑,将产业发展的波动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第三,继续推进全球化战略,对多边协定和区域协定并重,克服"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特朗普宣扬的贸易政策体现了"逆全球化"思潮在短期内逐渐加剧的特征,英国"脱欧"等事件也是"逆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但历史经验表明,参与和推动全球化能使中国充分参与国际分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在"逆全球化"初露端倪之际,中国政府需要坚持全球化战略,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对待各种形态的全球化发展,支持以诸边方式进行谈判。特别地,中国需要努力在亚太地区提升影响力,在区域内承担起更多责任,发挥国际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角色,展现推进全球化的坚定决心,更充分地融入到区域发展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力争成为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分享更为丰厚的贸易利益。

〔责任编辑:许明〕

The Talks on Paper of the Deglob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eal Economy

TONG Jia-dong, XIE Dan-yang, BAO Qun, HUANG Qun-hui, LI Xiang-yang, LIU Zhi-biao, JIN Bei, YU Miao-jie, WANG Xiao-song

Editorial Notes: At present, the deglobalization trend is arising in the global context,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has risen. This trend will profoundly affect the glob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re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the de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eal economy, we planned this written discussion on the basis of the speech in the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High Front Forum (2017·Spring), whose theme is the de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real economy. We invited nine well-known scholars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ization, the impact of the deglobalization on China's economy and China's response. This group tries to explain and answer the new problems and new phenomena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for China to actively guide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wards a more inclusive and popular direction.

Key Words: deglobalization; global value chain; the Belt and Road; industri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eal economy; manufacturing;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China-U.S. trade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